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on the Non-Performing Loans of China's Listed City

Commercial Banks and the Countermeasure

by

Rujian Zhong

A Dissertation Presen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pproved March 2022 by the  
Graduate Supervisory Committee:

John Zhang, Co-Chair

Ning Zhu, Co-Chair

Jie Hu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May 2022

新冠疫情对我国上市城商行不良贷款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仲如见

全球金融工商管理博士  
学位论文

研究生管理委员会  
于二零二二年三月批准：

张中举，联席主席  
朱宁，联席主席  
胡捷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二零二二年五月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auses of non-performing loans of commercial banks in my country, and analyzes the non-performing loans, profitability, and capital adequacy of city commercial banks before and after the new crown epidemic. Comparisons are made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anges in the scale of non-performing loans of city commercial banks after the new crown epidemic,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increased non-performing disposal. The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direct impact of the new crown epidemic on city commercial banks' non-performing loans from the path of companies, individuals, and banks themselves.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indirect influence mechanism of non-performing loans of urban commercial banks from the policy aspects of "wider credit", "wider supervision" and "wider currency".

I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en economic indicators from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8 to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20 are selected as control variables,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macro, industry and bank. The non-performing loan rates of 20 listed city commercial banks are selected as the explained variables. Establish a continuous double difference model to conduct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the new crown epidemic on the non-performing loan rate of Chinese city commercial banks, and conduct stability and impact mechanism test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more severely impacted by the epidemic, the more obvious the economic impact will be.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non-

performing loan ratio of city commercial banks increases more, and the epidemic has a continuous and time-lag impact on the non-performing loan ratio of city commercial banks. The bank capital adequacy ratio is selected as the explained variable to conduct a robustness test. Select industrial value-added and per capita income of residents as channel variables to test the impact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dustrial value-added and per capita income of residents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non-performing loans of city commercial banks.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ults, 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made on the disposal of non-performing loans of city commercial banks and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event adverse risks caused by the epidemic.

## 摘要

城市商业银行是我国银行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本文从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成因进行分析，从新冠疫情前后城商行不良贷款、盈利能力、资本充足性等角度进行比较，总结新冠疫情之后城商行不良贷款规模上升、区域分化、不良处置加大等特征变化。然后，从企业、个人和银行本身等路径全面系统地分析新冠疫情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的直接影响，并从“宽信用”、“宽监管”和“宽货币”等政策层面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的间接影响机制进行分析。

在实证分析上选取 2018 年一季度至 2020 年四季度的 9 个经济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分成宏观、行业和银行等三个层次，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 20 家上市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建立连续型双重差分模型对新冠疫情对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进行稳定性和影响机制检验，得出了受疫情冲击越严重的地区，经济受影响越明显，因而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增加得越多的结论，而且疫情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率且具有连续且时滞性的影响。相比高拨备覆盖率的城市商业银行，疫情更能提高低拨备覆盖率、抵御风险较低的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选取银行资本充足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选取工业增加值和居民人均收入作为渠道变量，进行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说明工业增加值和居民人均收入对城商行不良贷款有负向的影响。最后，在理论和实证结果的基础上，对城商行不良贷款处置和有效预防疫情带来不良风险的措施提出相关建议。

## 目录

	页码
表格列表 .....	vii
图表列表 .....	viii
章节	
第一章 绪论 .....	1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
1.1.1 选题背景 .....	1
1.1.2 研究意义 .....	2
1.2 文献回顾 .....	3
1.2.1 关于城商行不良贷款成因的研究现状 .....	3
1.2.2 关于新冠疫情对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研究综述 .....	4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5
1.3.1 研究内容 .....	5
1.3.2 主要研究方法 .....	6
1.3.3 研究创新点 .....	6
第二章 新冠疫情后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特征分析 .....	7
2.1 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成因分析 .....	7
2.1.1 城商行现状分析 .....	7
2.1.2 银行不良资产指标定义 .....	8

章节	页码
2.1.3 银行不良贷款外部成因 .....	19
2.1.4 银行不良贷款内部成因 .....	24
2.2 新冠疫情前后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特征研究 .....	25
2.2.1 不良贷款规模上升 .....	25
2.2.2 不良率呈现区域分化 .....	28
2.2.3 不良贷款处置加大 .....	31
第三章 新冠疫情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的影响机制分析 .....	33
3.1 新冠疫情影响城商行不良贷款的直接路径 .....	33
3.1.1 企业部门违约风险上升 .....	33
3.1.2 居民部门还贷能力下降 .....	36
3.1.3 银行部门盈利能力下降 .....	40
3.2 新冠疫情影响城商行不良贷款的间接路径 .....	43
3.2.1 “宽信用”政策影响分析 .....	43
3.2.2 “宽监管”政策影响分析 .....	46
3.2.3 “宽货币”政策影响分析 .....	47
第四章 疫情影响上市城商行不良贷款的实证研究 .....	50
4.1 研究假设与模型介绍 .....	50
4.1.1 研究假设 .....	50
4.1.2 模型介绍 .....	51

章节	页码
4.1.3 指标选取 .....	52
4.2 实证分析 .....	55
4.2.1 疫情对上市城商行不良贷款的影响 .....	55
4.2.2 稳定性检验 .....	58
4.2.3 影响机制检验 .....	59
第五章 后疫情时代下城商行不良贷款处置与防范 .....	62
5.1 后疫情时代下城商行不良贷款处置 .....	62
5.1.1 推动运用科技手段开展不良资产清收处置 .....	64
5.1.2 优化不良贷款清收处置管理机制 .....	64
5.2 后疫情时代下城商行不良贷款的风险防范 .....	65
5.2.1 注重表内外资金统筹管理与优化 .....	65
5.2.2 着力深化客户聚焦及特色化发展 .....	66
5.2.3 用精细化管理实现降本增效 .....	66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68
6.1 本文结论 .....	68
6.2 研究展望 .....	69
参考文献 .....	70



## 表格列表

表格	页码
1 资本充足系列标准规定 .....	9
2 贷款分类 .....	12
3 不良资产率、不良贷款率 .....	13
4 拨备覆盖率、贷款拨备率 .....	17
5 部分城商行信贷质量的相关指标 .....	19
6 不同类型银行的净利润变化 .....	27
7 各省城商行数量分布 .....	29
8 变量解释 .....	54
9 描述性统计 .....	55
10 实证结果 .....	56
11 稳健性检验结果 .....	59
12 新冠疫情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的影响路径检验 .....	61
13 关于不良贷款处置的政策 .....	63

## 图表列表

图表	页码
1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比例.....	2
2 2012-2020 年中国城商银行数量统计（单位：家） .....	8
3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	9
4 不同类型的银行资本充足率变化.....	10
5 城商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净息差 .....	11
6 城商行和农村金融机构资产利润率.....	11
7 2018 年-2020 年中国代表性城商行不良贷款率对比（单位：%） .....	15
8 贷款损失准备的种类 .....	16
9 不同银行的不良贷款和拨备覆盖率.....	25
10 不同类型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变化趋势 .....	26
11 不同类型银行的净利润当季同比增速.....	27
12 不同类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变化.....	28
13 2020 年 6 月底不同地区银行的不良贷款率 .....	29
14 2020 年 6 月不同地区的不良率变化幅度（单位：bp） .....	30
15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核销规模.....	32
16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环比增速 .....	32
17 2021 年不良贷款规模显著增加的行业 .....	34
18 2021 年主要“灰犀牛”式风险 .....	35

图	页码
19 2021 年信用违约风险最突出的主体.....	35
20 中国家庭债务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单位：%）.....	36
21 居民消费贷款 ABS :1-30 天的逾期率（数据来源:cNASS）.....	37
22 居民消费贷款月度早偿率（数据来源:cNASs）.....	38
23 中国失业率变化.....	39
24 农村金融机构和城商行的资产同比和净利润同比变化.....	41
25 2016-2020 年不良 ABS 发行单数和规模.....	42
26 中国宏观杠杆率变化.....	43
27 社会融资总额与新增人民币贷款（亿元）.....	44
28 新增社融种类变化（亿元）.....	45
29 季调后的贷款利率和新增贷款.....	45
30 我国基础货币增速.....	48
31 7 天逆回购操作利率变化.....	49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起源于2019年12月的新冠肺炎疫情，由于前期防范措施的薄弱以及病毒传播的途径过于隐蔽，导致此次疫情对于我国宏观经济和银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相比较于2003年的SARS疫情而言，此次疫情的爆发点正处于中国经济新常态期间，尤其是在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不断放缓的情况下，银行业的经营环境更加严峻。城商行对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助力中小企业成长和提供城乡居民融资服务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国际形势严峻和疫情冲击的背景下，外部经济金融环境、超常规纾困政策对于城商行的信贷质量带来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

2020年，政府、企业、个人的杠杆水平显著上升，商业银行整体的不良贷款率也显著攀升，其中城商行由于其自身抗风险程度较低，受到疫情影响，净利润和不良贷款的变动幅度较大。加之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的实施，虽然短时间内缓解了压力，但隐藏了风险。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使银行业不良贷款上升是必然趋势，所以从2020年开始加大了不良贷款处置力度。为了应对不良的延迟暴露，城商行不良处置的力度仍需加大，不良风险的防范仍需加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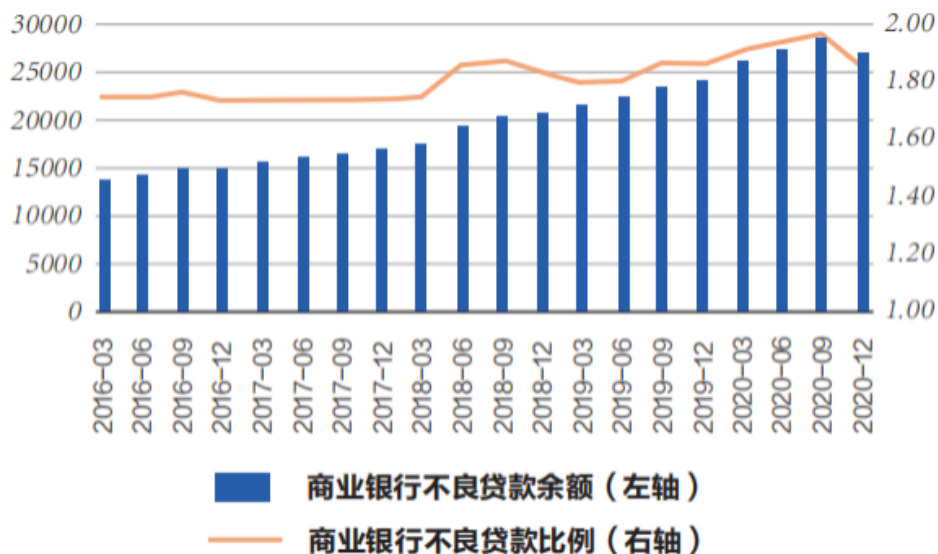


图 1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比例

本文在理论梳理的基础上，描述了我不同地区城市商业不良贷款的现状特征并分别从宏观层面、银行层面和企业层面分析了城商行不良贷款的成因，进而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对宏观经济、企业等方面的影响造成的对我国城商行风险管控的挑战，实证分析城商行爆发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下完善应对城商行风险的政策建议展开深入的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下城市商业银行应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公司管理改革优化、构建问题银行处置法律框架等。

### 1.1.2 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理论意义：当新冠疫情下宏观经济下行，城商行会有更多的不良贷款暴露。本文以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为实证研究的因变量，深入分析疫情因素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的影响机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新冠疫情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具有很好的理论意义。

现实意义：本文从理论和实践分别探讨新冠疫情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程度和影响路径，并提出了城商行处置不良贷款的建议和风险防范措施，对城商行自身能进一步提高自身资产质量具有现实意义。

## 1.2 文献回顾

### 1.2.1 关于城商行不良贷款成因的研究现状

国内大部分学者，如梁秋霞（2012）、张意磊（2017）等都对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总结，并将其影响因素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即宏观经济、政府政策、贷款企业信用等，内部因素即银行内部员工道德诚信、银行相关贷款流程、不良贷款处置等因素。谢海东、郝奕博（2017）发现市场利率上升也会导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增加。孙明哲、赵领娣（2020）认为，在宏观经济中GDP作为影响银行不连贷款因素之一对不良贷款影响最为显著，且GDP和失业率会导致不良贷款的增加。

应海芬（2018）认为经济增速与城商行不良贷款率呈现负向相关关系，长期协整且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谢太峰等（2020）基于我国45家城商行的财务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2013-2018年期间，城商行信用风险受到货币膨胀率和自身总资产规模的影响；对于中型城商行的信用风险除了受总资产规模影响，还和资产收益率和GDP增长率有关；对于小型城商行的信用风险而言，资产收益率、成本收入比以及货存比对其都有显著影响。

Salas.V &Saurina（2002）基于1985--1997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动态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信贷的快速扩张对西班牙储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具有显著影响。Jimenez.G& Saurina（2005）采用了1984年至2003年的数据样本验证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对西班牙

银行不良贷款有较大的影响。De Bock. R.& Demyanels（2012）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能引起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上升。

### 1.2.2 关于新冠疫情对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研究综述

王丹阳（2020）通过分析流动性缺口、流动性匹配率（LMR）、流动性覆盖率（LCR）、净稳定资金比例（NBFR）等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表明了疫情对于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业务都有影响。王旌全（2021）认为疫情导致我国的批发业、租赁业、零售业、商务服务业、房地产等各行业都出现客户贷款逾期或者违约，不良贷款余额大幅增加，不良资产增幅明显上升。王云龙、叶皓明等（2021）建立了宏观经济传导模型和信贷风险传导模型，预计疫情带来巨大的潜在不良贷款增量，可能导致抗冲击能力较弱的银行出现重大信用风险。刘杭（2021）认为疫情导致经济下行、企业破产、失业率增加等从而使不良贷款增加。陶秉吉等（2021）分析疫情下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增加的原因及其影响，最后提出应对流动性风险增加的措施与建议。

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国内外的学者普遍认为经济增长、货币政策、信贷总量和企业经营状况等是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因素。但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之下，社会各方面都受到了疫情的冲击，较少深入分析银行不良贷款在此新的背景下变化情况的研究，而且现有的研究新冠疫情对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的文章一般采取定性描述的方法，缺少系统的机理分析和定量支撑。本文从宏观层面、银行层面和企业层面等全面梳理疫情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的影响机理，并实证分析新冠疫情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的具体影响如何，城商行要采取什么措施预防疫情带来的风险。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城市商业银行是我国银行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本文从宏观层面、银行层面和企业层面等全面梳理疫情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的影响机理，并实证研究新冠疫情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的具体影响，提出城商行预防疫情风险的措施和建议。

文章整体结构如下：

第一章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之下，梳理以往的相关文献和理论提出主要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成因进行分析，从新冠疫情前后城商行不良贷款、盈利能力、资本充足性等角度进行比较，总结新冠疫情之后城商行资产质量的特征变化。

第三章从企业、个人和银行本身等层面全面系统地分析新冠疫情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的直接影响机制，并从“宽信用”、“宽监管”和“宽货币”等政策层面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的间接影响机制进行分析。

第四章通过搜集的数据，针对新冠疫情对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进行稳定性和影响机制检验，得出结论。

第五章在理论和实证结果的基础上，针对城商行不良贷款处置和有效预防疫情带来的不良风险提出相关措施和建议。



### 1.3.2 主要研究方法

(1) 定性与定量相统一。本文从内外部因素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成因进行定性分析，从新冠疫情前后城商行不良贷款、盈利能力、资本充足性等角度进行定量的比较，总结新冠疫情之后城商行不良贷款规模上升、区域分化、不良处置加大等特征变化。

(2)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理论上，从企业、个人和银行本身等路径全面系统地分析新冠疫情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的直接影响，并从“宽信用”、“宽监管”和“宽货币”等政策层面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的间接影响机制进行分析。从实践上，利用历史数据，研究我国城商行不良贷款受到的疫情影响程度和影响路径。

(3) 实证分析法。本文通过构建一个连续型双重差分模型，并以区域经济、企业、个人和银行内部等层面的变量为数据样本，对20家城商行不良贷款受疫情波动的影响进行了面板实证分析。

### 1.3.3 研究创新点

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在于:研究对象方面，以微观层面的城商行的不良贷款作为分析对象。区别于研究主要商业银行或者国有银行，本文从城商行这一特殊的个体角度出发，结合特定的区域发展、企业、个人、银行等微观因素进行研究。

其次，本文结合当前疫情时代的特点，研究新冠疫情对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并从区域经济、企业、个人、银行等多维度分析了背后的影响机制，探讨了不良贷款的异质性影响，从而为研究新冠疫情对银行不良贷款率的程度和路径提供了新证据。

## 第二章 新冠疫情后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特征分析

### 2.1 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成因分析

#### 2.1.1 城商行现状分析

城市商业银行是在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组建成立的区域性银行，是区域性金融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 年以来，在国家金融政策支持下，经营范围突破地域限制，多家城商行增资重组和跨区发展，资本实力不断增强。2007 年以后，多家城商行如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相继上市，城商行迎来快速发展期。截至 2020 年 6 月末，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总资产 39.56 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 13.12%。

城商行自组建以来，其数量呈现出先增后减之后达到稳定的状态，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共有 133 家城商行，总资产破万亿的银行有 6 家，位于第一梯队；5000-10000 亿元之间的城商行数量达到了 11 家。5000 万总资产以下企业数量高达 116 家，占企业总数的 87%。第一梯队城市商业银行已经跻身大型商业银行的队伍，而第三梯队的商业银行还处在规模小、发展粗放、数量众多的谋求生存阶段，城市商业银行整体呈现出发展极其不均衡。

城市商业银行数量（单位：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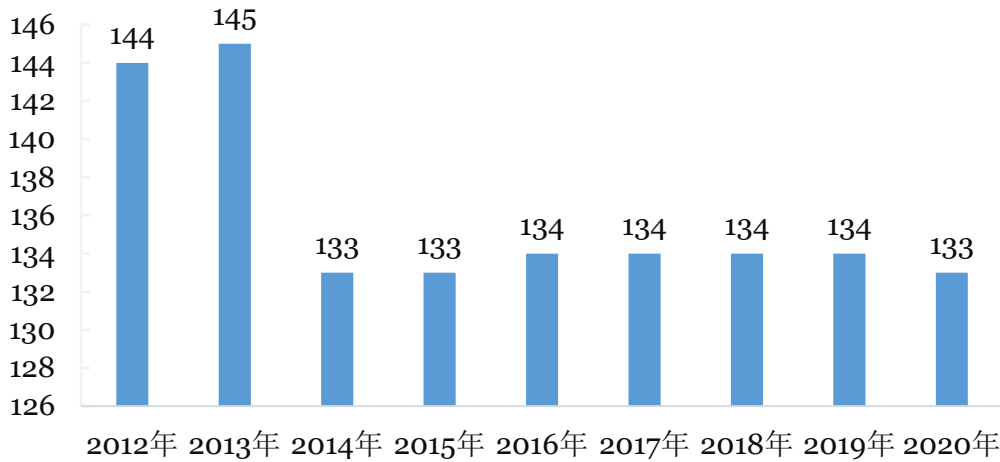


图 2 2012-2020 年中国城商银行数量统计（单位：家）

### 2.1.2 银行不良资产指标定义

商业银行通过贷款业务获得利润，即通过放款收回本金和利息，但若难以收回放款本金和利息，便会面临坏账风险。银行资产质量关系着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因此我国银保监会制定多项指标对银行的资本质量和风险进行监管。以下主要对资产质量指标（不良资产率、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贷款拨备率和逾贷比）和资本充足类指标（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等多项指标及其之间的关系结合银行数据进行解析。

#### 1. 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是最重要的监管指标，资本是吸收风险的第一道防线，一是为了在保证存款人、债权人的利益前提下，保障银行能有足够的自有资金弥补损失；二是资本充足率体现银行风险的程度。因此，资本充足率越高的银行对于不良资产的吸收能力越强，也相对越安全。目前，银监会先将银行分为系统性重要银行和其他银行两大类，然后对不同类别的银行设置不同的监管要求，我国银监会对资本充足系列标准规定如下：

表 1 资本充足系列标准规定

公式	系统性	其他银行	
	重要银行		
核心一级 资本充足率	$(\text{核心一级资本}-\text{对应资本扣减}) \div \text{风险加权资产}$	8.50%	7.5%
一级资本 充足率	$(\text{一级资本}-\text{对应资本扣减}) \div \text{风险加权资产}$	9.50%	8.5%
资本充足率	$(\text{总资本}-\text{对应资本扣减项}) \div \text{风险加权资产}$	11.50%	10.5%
			(8%+2.5%)

从我国商业银行总体资本充足率来看，2020 年以前，资本充足率呈现上升态势，但从 2020 年初疫情爆发开始，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有个明显的下降趋势，直到 2020 年年中之后才有所回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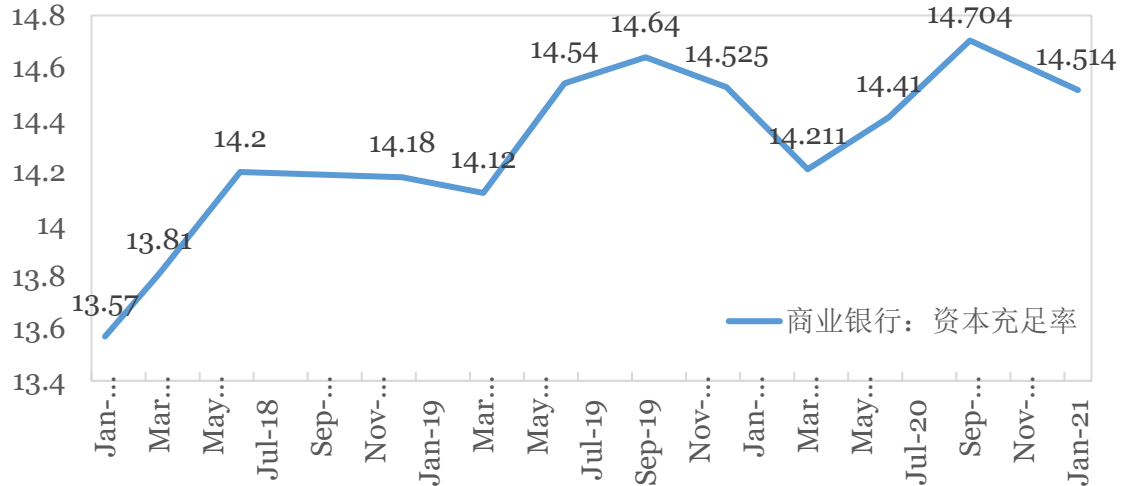


图 3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

从不同类型的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变化来看，城商行处于行业低位水平，且呈现下降趋势。近几年金融监管趋严，城商行面临资产结构调整的压力，表外资产回表均加剧了资本消耗，资本需要补充计提，不良贷款规模的增大，资本充足率上升空间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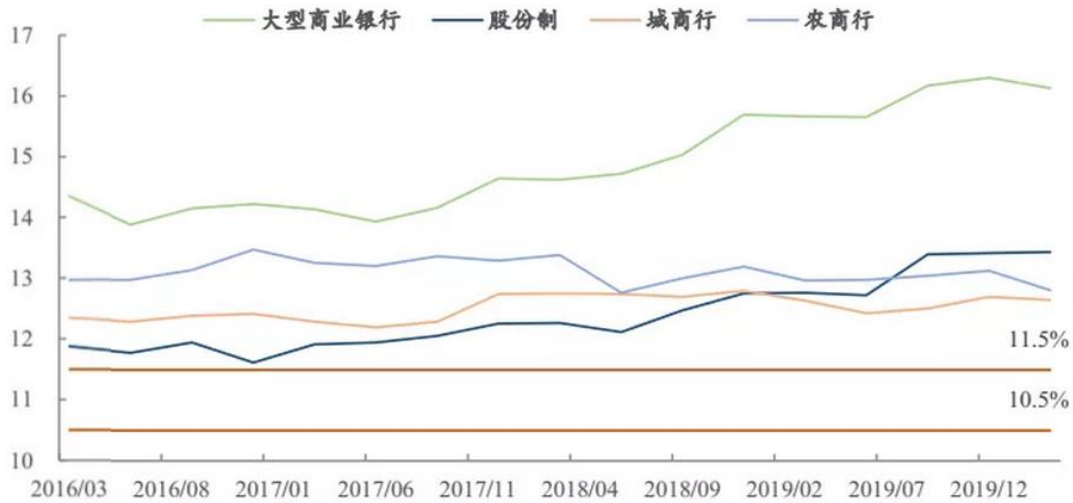


图 4 不同类型的银行资本充足率变化

## 2.净息差

净息差反映商业银行生息资产赚取净利息收入的能力。公式为： $(\text{银行全部利息收入} - \text{银行全部利息支出}) \div \text{全部生息资产}$ 。理论上净息差越高意味着盈利能力越强。但是实际上收益越高的资产风险越大，利率越高的贷款发生不良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然后通过计提拨备、核销等方式反过来又会减少银行的利润。所以净息差并非越高越好，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之内即可。

疫情爆发以来，城商行的净息差有小幅的下降，2020年3月之后，城商行的净息差均止跌企稳，但农村金融机构的净息差水平还在三季度略微有所上升。在净息差逐渐平稳的情况下，城商行和农商行的盈利水平并未得以改善，资产利润率仍呈下降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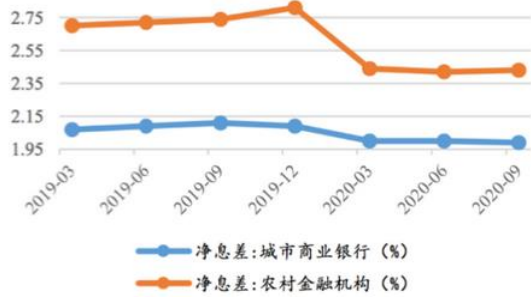


图 5 城商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净息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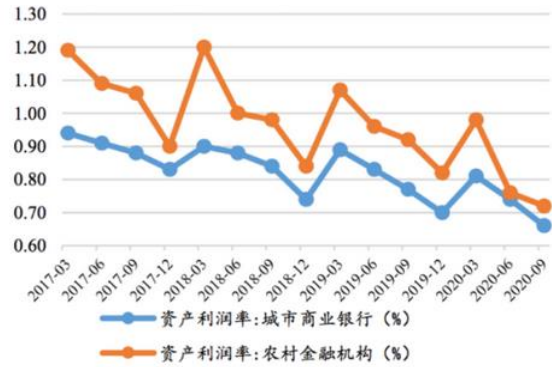


图 6 城商行和农村金融机构资产利润率

### 3.不良资产率与不良贷款率指标

银行的不良贷款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不良贷款广义上指银行在资产业务经营中，超出事先估计将要面临的风险，从而给银行造成损失的资产。狭义的不良贷款是指银行在一般信贷业务中，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借款人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如约足额地偿还银行本金和利息，给银行带来的资金损失，便将该笔贷款划分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本文主要讨论狭义上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

依据信贷资产的风险分类认定不良贷款，1998年5月，央行制定了《贷款分类指导原则》，要求商业银行依据借款人的实际还款能力将贷款进行五级分类，即按违约风险程度将贷款划分为五类：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其中后三种统称为不良贷款。

表 2 贷款分类

类别	定义	贷款损失率
正常贷款	借款人能够履行合同，一直能正常还本付息，不存在任何影响贷款本息及时全额偿还的消极因素，银行对借款人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息有充分把握。	0
关注贷款	尽管借款人目前有能力偿还贷款本息，但存在一些可能对偿还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如果这些因素能继续下去，借款人的偿还能力收到影响。	不超过 5%
次级贷款	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出现明显问题，完全依靠其正常营业收入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需要通过处分资产或对外融资乃至执行抵押担保来还款付息。	30%~50%
可疑贷款	借款人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抵押或担保，也肯定要造成一部分损失，只是因为存在借款人重组、兼并、合并、抵押物处理和未决诉讼等特定因素，损失金额的多少还不能确定。	50%~75%
损失贷款	指借款人已无偿还本息的可能，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和履行什么程序，贷款都注定要损失了，或者虽然能收回极少部分，但其价值也是微乎其微，从银行的角度看，也没有意义和必要再将其作为银行资产在账目上保留下来，对于这类贷款在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应立即予以注销。	75%~100%

不良资产还包括其他存在价值缩水风险的资产，不良贷款是不良资产的一部分。在国内，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也就是不良贷款，不良资产率和不良贷款率的指标评定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不良资产率，指表示所有的不良资产占有全部资产的比率。不良贷款率指所有不良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率。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不良贷款率是两个被动指标，监管要求分别不能超过 4%和 5%，如表 3 所示。

表 3 不良资产率、不良贷款率

指标名称	指标定义	监管要求
不良资产率	不良资产率=不良信用风险资产/信用风险资产 ×100%	≤4%
不良贷款率	不良贷款率=(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损失类 贷款)/各项贷款期末余额×100%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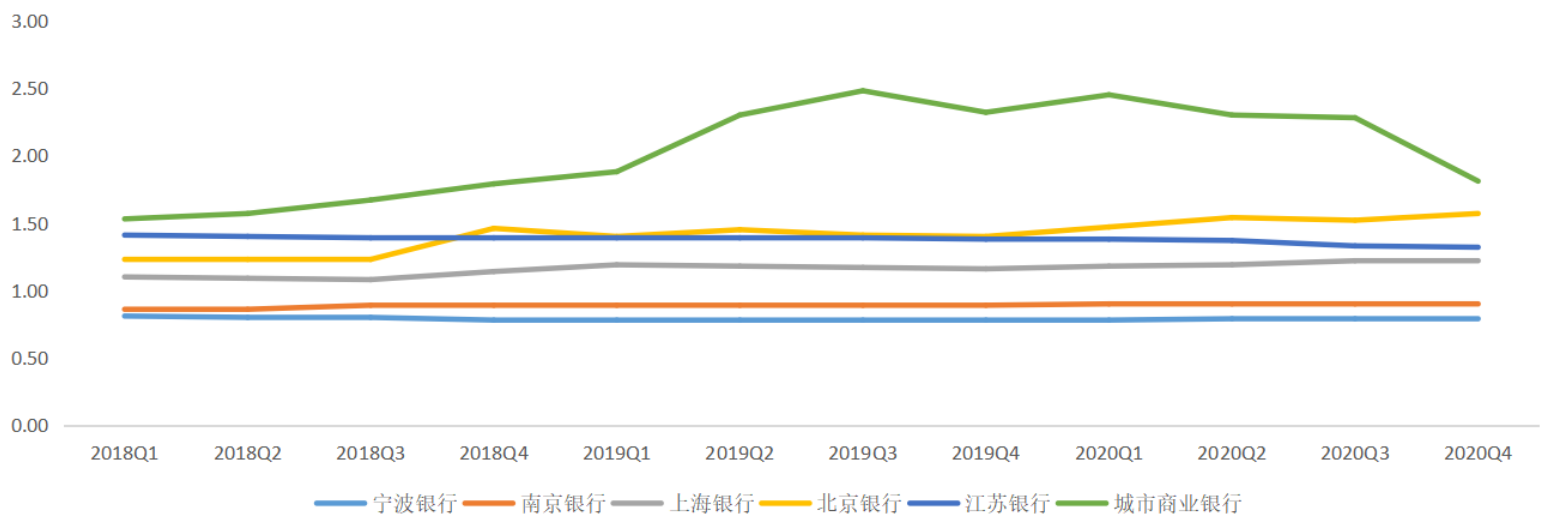
一般而言，借款人拖延偿还本金和利息超过 90 日，该笔贷款就会被视为不良贷款，如果银行完全不能收回该笔贷款，此笔不良贷款最终将会变成坏账。不良率是所有监管指标中最核心的一项，如果超过监管要求会影响银行评级。不良资产率和不良贷款率的大小代表着银行信贷资产的整体质量，不良贷款会蚕食银行盈利，不良比率愈高，代表银行潜在收不回放款的比重愈大，表示银行资产素质愈差，影响银行对经济的支撑能力，同时影响着银行的利润，甚至导致银行破产。不良率指标理论上越低越好，当不良贷款率超过监管要求的 5%，会受到监管机构的严重制约，影响银行考核和其他业务的开展。因此银行会通过一定方式对不良进行调整，比如不将 90 天以上的贷款纳入不良贷款，由于不良率与其他指标密切相关，减少不良贷款会提高逾贷比；另一种办法是增加贷款规模，但前提是商业银行本身的资本够用。此外，银行也可能在资产端进行调整，将一般企业贷款转向风险更低的贷款，提高贷款客户的资质。对于已形成的不良资产，银行也会采取债转股、债转股、不良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实现出表。

受到疫情的影响，鼓励银行实行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之后适用范围扩大到个体经营者，在一定时间内降低了银行业不良贷款数量。截至 2020 年末，工



商银行小微贷款方面，延本延息贷款劣变比例为 0.8%。虽然 2020 年工商银行已提前消化了一些出现实质风险的延本延息贷款，为 2021 年继续逐步有序释放延本延息贷款风险和平滑对资产质量的影响，但未来延本延息贷款的处理释放将会影响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

2018 年以来，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规模整体呈上升趋势，不良贷款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2020 年第四季度，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约规模为 3660 亿元，不良贷款率为 1.81%。以下列代表性银行公布的从不良贷款率数据来看，2020 年，宁波银行不良贷款率最低，为 0.79%，仅为城市商业银行的 43%。



15

	2018Q1	2018Q2	2018Q3	2018Q4	2019Q1	2019Q2	2019Q3	2019Q4	2020Q1	2020Q2	2020Q3	2020Q4
宁波银行	0.8100	0.8000	0.8000	0.7800	0.7800	0.7800	0.7800	0.7800	0.7800	0.7900	0.7900	0.7900
南京银行	0.8600	0.8600	0.8900	0.8900	0.8900	0.8900	0.8900	0.8900	0.9000	0.9000	0.9000	0.9000
上海银行	1.1000	1.0900	1.0800	1.1400	1.1900	1.1800	1.1700	1.1600	1.1800	1.1900	1.2200	1.2200
北京银行	1.2300	1.2300	1.2300	1.4600	1.4000	1.4500	1.4100	1.4000	1.4700	1.5400	1.5200	1.5700
江苏银行	1.4100	1.4000	1.3900	1.3900	1.3900	1.3900	1.3900	1.3800	1.3800	1.3700	1.3300	1.3200
城市商业银行	1.5300	1.5700	1.6700	1.7900	1.8800	2.3000	2.4800	2.3200	2.4500	2.3000	2.2800	1.8100

图 7 2018 年-2020 年中国代表性城商行不良贷款率对比（单位：%）

#### 4. 拨备覆盖率与贷款拨备率指标

贷款损失准备金 (loan loss reserves) 是银行预留应付坏账的准备金，贷款减值准备增加意味着银行为未来的坏账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如果未来贷款质量较好，或者银行有充足的信心，不会预留太多准备，则贷款减值准备减少，减少的准备金会作为营业支出记入当期利润。

如图 8 所示，贷款损失准备金分为三类，专项损失准备金是按照贷款分类结果计提的，不具有资本的性质，不能计入资本基础。一般准备金又叫普通准备金，是贷款组合余额的损失准备。特别准备金是针对贷款组合中的特定风险，按照一定比例提取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只有遇到特殊情况才计提特别准备金，不是商业银行经常提取的准备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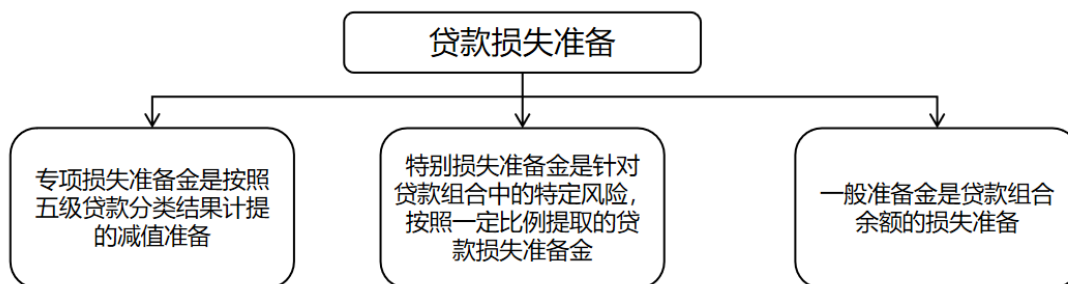


图 8 贷款损失准备的种类

我国绝大部分银行贷款损失准备来自于专项损失准备金和普通准备金，贷款损失准备是用来应对预期损失，保证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属于风险抵补类指标。贷款减值准备金与各项贷款余额的比率是贷款拨备率，要求大于等于 2.5%。对于新成立的银行来说没有足够的不良和拨备，所以这一指标要求很难达到。不过监管允许新成立的银行过渡 3 年再通过计提完成这个指标比例。

表 4 拨备覆盖率、贷款拨备率

指标名称	指标定义	监管要求
拨备覆盖率	$(\text{一般准备} + \text{专项准备} + \text{特种准备}) / (\text{次级类贷款} + \text{可疑类贷款} + \text{损失类贷款}) \times 100\%$	$\geq 150\%$
贷款拨备率	$\text{贷款减值准备金} / \text{各项贷款余额} \times 100\%$	$\geq 2.5\%$
不良率	$\text{贷款拨备率} / \text{拨备覆盖率} \times 100\%$	1.667%

拨备属于预期损失，拨备覆盖率是实际上银行贷款对于可能发生的呆、坏账提取准备金的比率。拨备覆盖不良贷款的倍数监管要求为大于等于 150%，拨备覆盖率公式为： $(\text{一般准备} + \text{专项准备} + \text{特种准备}) / (\text{次级类贷款} + \text{可疑类贷款} + \text{损失类贷款}) \times 100\%$ ，应该与不良贷款率、各项贷款余额同升同降。假如某银行有 100 亿的不良，但是按规定还需要计提 150 亿的拨备，如果不考虑房产抵押，一笔贷款出现不良，最多损失就是 100%。监管部门最初制定 150% 的比例是基于对银行的不信任，认为银行会隐藏部分不良。如果银行没有隐藏不良，即使没有质押，70%—80% 的拨备(国际标准)都可以应对贷款损失。

#### 5.城商行相关指标的关系

表 5 列出了部分商业银行的信贷相关数据，大部分银行 2018 年逾贷比与 2017 年相比是下降的，如吉林银行 2018 年的逾贷比尽管仍高达 248.0%，但是从 2017 年的 381.4% 降到 248.0% 的；唯一一个不降反升的是盛京银行，从 2017 年的 97.9% 上升至 2018 年的 328.0%。从表面上看，不良贷款率上升比较快的银行是富滇银行、宁夏银行、吉林银行、洛阳银行，但实际上，如果把逾贷比还原的话，这几家银行不良贷款率实际上没有

上升。富滇银行之所以从 1.90% 上升到 4.25%，并不是它的不良贷款率真的上升了，只是因为逾贷比调到了 98.7%；如果它的逾贷比仍然保留在 278.1%，其不良贷款率还是会在百分之一点多。同样，宁夏银行如果逾贷比仍然保留在 336.7%，其不良贷款率应该是下降的，大概在 1.5% 左右。所以，看一家银行的不良不要看其存量，而要看其动态，动态比存量更有价值，除非不良存量超过 10%。但同时需要具体分析，如果低于 10% 是没有风险的，且又呈下降趋势，趋势比静态更重要。对于不良贷款，只要是正常的业务，哪怕是应收款类投资有些不良，如果是 10% 以内的不良，且应收款类投资项没有被大量占用，实际上从动态看更有价值。吉林银行的逾贷比从 381.4% 降到 248.0%，虽然仍然不符合监管要求，但是它已经下降，真正的不良贷款率并没有上升，如果逾贷比还原成 381.4%，那么不良率还是 1.7% 左右，真实的不良率乘以 2.5，大概是 5% 左右，所以，不良率必然较高。

唯一一家逾贷比上升的是盛京银行，如果 180 亿注资能按照公告成功注进也是比较安全的。有异常的是营口沿海银行，它的逾贷比从 346.7% 下降到 94.2% 有点让人难以置信，结果其不良贷款率反而从 1.53% 下降至 1.46%，这就更加反常；相反的，如果其不良贷款率上升至 3% 左右，反而比较可信。营口沿海银行其他指标都比较正常，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都是上升的，除非其 2018 年做了大量的注资，同时做了不良的处置。如果不良率下降导致拨备覆盖率也大幅度下降，说明新增不良的拨备计提不充分。此外，关注类贷款占比越低越好。结合迁移率指标，可判断广义口径的不良率。

表 5 部分城商行信贷质量的相关指标

银行名称		逾贷比	不良贷款率	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	资本充足率	一级资本充足率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富滇银行	2017 年	278.10%	1.90%	171.40%	13.90%	9.70%	9.70%
	2018 年	98.70%	4.25%	105.00%	13.00%	9.70%	9.70%
宁夏银行	2017 年	336.70%	2.20%	183.30%	12.90%	10.40%	10.40%
	2018 年	92.00%	3.79%	145.20%	13.20%	10.00%	10.00%
吉林银行	2017 年	381.40%	1.72%	191.20%	10.60%	8.70%	8.70%
	2018 年	248.00%	2.82%	149.90%	10.70%	8.90%	8.90%
洛阳银行	2017 年	307.40%	1.57%	305.50%	14.90%	10.80%	10.70%
	2018 年	217.00%	2.78%	182.40%	14.80%	10.90%	10.90%
汉口银行	2017 年	236.50%	2.14%	176.20%	12.80%	9.20%	9.20%
	2018 年	101.00%	2.11%	158.20%	13.60%	10.20%	10.20%
中原银行	2017 年	221.20%	1.83%	197.50%	13.20%	12.20%	12.20%
	2018 年	98.50%	2.44%	156.10%	14.40%	11.50%	9.40%
湖北银行	2017 年	369.00%	2.25%	184.00%	13.70%	9.50%	9.50%
	2018 年	79.20%	2.21%	144.20%	14.00%	10.90%	10.90%
盛京银行	2017 年	97.90%	1.49%				
	2018 年	328.00%	1.17%	160.80%	11.90%	8.50%	8.50%
营口沿海 银行	2017 年	346.70%	1.53%	166.00%	11.50%	9.40%	9.40%
	2018 年	94.20%	1.46%	193.00%	12.00%	0.00%	10.10%

### 2.1.3 银行不良贷款外部成因

#### 1、外部因素—宏观经济影响

从历史规律来看，整体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外部宏观经济变化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关联性。自 2011 年以来，受世界经济下行、欧债危机蔓延的影响，中国经济整体处于下滑

周期，社会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开始暴露，原先过度依赖低端产业、低成本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消耗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发展遭遇不利境况，增长速度下滑、企业持续面临风险。根据近几年国内经济发展数据的分析发现，生产总值增幅水平呈现逐年降低的变化趋势，各产业风险要素逐步显现。根据最近公布的中国经济发展数据可知，整体经济增长表现并不理想，面临的各方压力要素较多，这也是不良贷款率持续提升的关键外部原因。

一般来说，国内生产总值与不良贷款呈现负相关关系（王睿，2018）。当经济处于上行期时，宏观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企业生产经营规模和利润均保持快速增长状态，银行信贷也相应地大幅扩张。而过度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企业对未来现金流持乐观预期，推动信贷扩张。随着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进一步扩张，企业对银行贷款越来越依赖。当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管理效率满足不了贷款规模增加的要求，就难以避免盲目性和非理性地投放信贷投放，最终导致城商行贷款质量下降，不良贷款增加。在经济下行期间，产品和服务需求大幅萎缩，银行担忧企业未来现金流减少，城商行的净息差即存贷款利润空间可能会缩小。加之城商行之间竞争关系较为激烈，为抢占市场，城商行往往会降低信用门槛，对信用等级低的企业及抗风险能力弱企业进行贷款，这会加大了不良贷款增加的可能性。

经济周期与信贷周期一般呈现同向变化的规律，这种周期叠加的现象，加大了经济调控和管理银行资产质量的难度。如果处理不当，整个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很可能陷入恶性循环，引发系统性风险。

## 2、外部因素—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的变化也会引起银行信贷的变化，在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快速上涨期，可抵押资产规模增长，银行会增加信贷规模。随着银行信贷投放规模的增长以及资产价格进一步提高，投资过热导致企业或者个人对银行贷款过于依赖。当资产价格上升到某一个点，因为某些突发事件的影响，金融市场的趋势被逆转，房地产、股票等价格开始严重缩水，银行为了应对损失不断压缩贷款投放，这又进一步压低资产价格，抬高企业融资成本，促使经济也开始收缩。

如果从金融脆弱性的角度来讨论，明斯基（Minsky）曾提出“金融脆弱性假说”，他认为借款企业受到金融风险水平的影响，在借贷水平上分三种类型，分别为“庞兹”性，投机性和抵补性。当金融风险较低，商业银行为了赚取更多的效益会降低贷款条件，企业和个人也会偏向投机性和“庞兹”性，导致更高的负债水平。当金融市场形势不好，企业必然会遭受较大的冲击，民间投资大幅倒退，民间借贷规模急剧萎缩，导致企业债务增多但无法偿还甚至破产，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质量明显下降，信贷增速明显放缓，信用风险急剧增加。金融市场衰退导致不良贷款增多的根本原因是产业的空心化、低端化和企业在房地产、矿产等非主业领域的过度投资。

## 3、外部因素—利率管制

长期以来商业银行没有自主权来确定存贷款利率。在我国实施政府管制利率机制的环境下，银行无法通过调节利率购买或出售产品，银行也无需考虑风险成本及其分担问题，大大降低了竞争动力，同时，客户也无法通过利率区分银行的资信优劣，同样的利率既不



反映银行的资信状况，限制了银行提高效率的内生动力。尤其对于经验不足的城商行，整体缺乏风险识别和防范意识，也不能有效管理贷款组合的风险。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落地深化，银行的贷款利率区间逐步放开，贷款定价更加灵活，降低不良贷款水平很大部分依靠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和定价能力，但对于城商行来说，往往会为了追逐短期利润提高一定的信贷风险，疫情的爆发更是增加了银行资产与负债管理难度，银行间的差异化趋势将更加明显。有的银行业会受到较大冲击，2020年11月，“包商银行”破产，在同年的12月末，宁海中银富登村镇银行、万州滨江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宣布解散。在市场化的背景下，银行机构破产及重组情况难以避免。

#### 4、外部因素—政策影响

从历史角度来说，国内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爆发期有两轮。其一为1979年开始，政府全面推行拨改贷政策，逐步将国企的基本建设和营运资金由财政拨款改成银行贷款，政府对企业贷款行为不再进行参与；其二，商业银行开展债权性融资业务，企业债权人由财政机构转向银行，银行的约束力没有那么强，不良贷款开始大规模形成。

这两个时期，政府会针对某些政府项目、垄断性行业、新型行业的发展推行相应的政策，促使银行在政策推进下，忽略对获取政府支持的企业资信、发展经营等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导致不断调低对企业授信门槛，发放的信贷资金远高于正常水平。短期信贷业务呈现长期化取向特征，如果忽视高风险企业的违约风险，即使采用展期、政府资金转贷等方法来续贷，长期的风险也难以解决，最终造成大规模不良贷款。

## 5、外部因素—监管体制

银行业监管一方面需要保护客户的利益，另一方面也要保护银行的利益。如果出现监管不及时、监管力度相对不足、监管效率不高的问题，将会出现银行之间的不规范竞争、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出现银行套利和不合理扩张的问题。另一方面。企业更容易骗取银行贷款、蓄意逃废银行债务等，损害商业银行的利益，造成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增加。

面对监管政策，商业银行监管套利和逃避监管的行为一直存在。“影子银行”即由此形成，“影子银行”的信贷发放标准显著低于银行授信，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处理很容易变成不良贷款。监管层从 2017 年初开始对影子银行集中整治，监管政策重点清理了加通道、加杠杆和加嵌套的高风险业务，有效遏制了影子银行的野蛮生长，影子银行规模占 GDP 的比例从 2016 年底到 2019 年底下降了 37 个百分点，从 123% 下降至 86%。

银行监管最主要的作用是对商业银行有效债权提供足够的保护。我国监管政策还存在一定的漏洞，不能对全部的信用行为提供保护，且没有明确的相关惩治规定，则企业更容易逃脱银行债务，导致不良贷款不断累计。再者，债权银行没有被赋予足够的权力追缴债务企业，保护债权银行的监管政策还不完善，导致银行在债权保护方面处于受害的一方。最后，尤其对于城商行来说，面临更多的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干预的现象，往往为保护地方经济利益或讨好政府领导人，一些执法部门在帮助商业银行行使追缴权时不尽心尽力，在帮助商业银行催收贷款的过程中也不尽职尽责，难以实际收回商业银行的贷款，导致城商行的不良贷款无法得到及时的处理。

#### 2.1.4 银行不良贷款内部成因

银行不良贷款除了由经济、金融、利率、政策和监管的外部环境变化导致的，还在于银行本身对于信贷资质的把关，这与银行的发展理念、银行发展阶段、银行从业者甚至管理者的整体素质有关。

银行贷款业务盲目扩张，则不良贷款产生的可能性越高。银行的主要营收和利润主要来自于贷款业务，为了满足贷款规模的目标要求，商业银行追求短期收益，加快贷款业务扩张速度，没有对企业还款来源、担保能力等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分析，导致整体贷款质量水平的下降。

银行内部控制和管理不善，其不良贷款的存量及比率一般比较高。如果内部控制制度难以适应银行发展，发放贷款时存在漏洞，未能对借款企业的经营情况、资金使用情况、资信变化情况等信息数据进行跟进、更新、分析，不仅无法控制新的不良贷款的产生，还会导致信贷风险进一步加剧。

银行的风险意识及风险偏好，很大程度影响银行对待贷款的态度，一般用存贷比（贷款与存款的比例）的高低反映银行的风险偏好情况。存贷比越大，银行则相对喜好风险。这样的银行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信贷规模容易快速扩张，导致资本充足率和抵御风险能力快速下降，则银行不良贷款随之增加，反之亦然。

银行放贷人员素质不高，在贷款业务管理的过程当中主观臆断，忽视贷款在借款企业中的用途及流向，对借款企业后续的经营状况及市场前景缺乏良好的考察与监督，忽略了企业的重大事项以及企业真实现金流才是判断贷款是否正常的标准。

## 2.2 新冠疫情前后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特征研究

### 2.2.1 不良贷款规模上升

2020年初疫情爆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呈现双升的趋势。商业银行总体2020年全年不良贷款率较2019年上升了0.02个百分点，从1.84升到1.86。其中，城商行上升幅度最大，上升0.51个百分点，达到2.32；股份行上升0.14个百分点，达到1.64；农商行和外资行分别上升0.02个百分点和0.09个百分点，分别达到3.90和0.67。有两类银行不良贷款率是下降的，国有行和民营银行分别下降0.14个百分点和0.27个百分点，达到1.52和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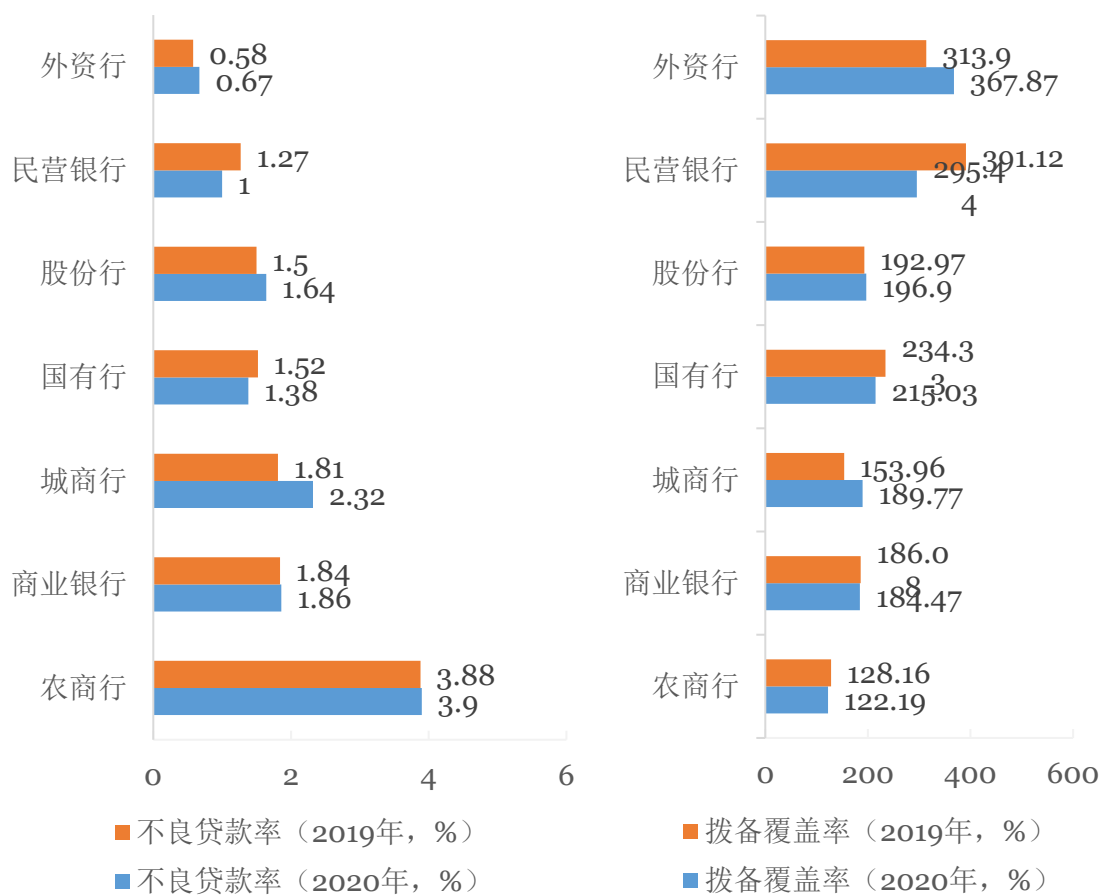


图 9 不同银行的不良贷款和拨备覆盖率

对比 2019 年和 2020 年拨备覆盖率的变化，2020 年商业银行总体的拨备覆盖率下降了 1.61 个百分点至 184.47%。城商行 2020 年全年拨备覆盖率大幅上升 35.81 个百分点，从 153.96% 增至 189.77%。拨备覆盖率与不良贷款率和净利润都有关系，城商行拨备覆盖率的上升，可能是大幅度计提拨备，也有可能是不良率下降，因为城商行 2020 年不良贷款率上升了，所以应该是拨备大幅计提，这样会导致城商行净利润大幅下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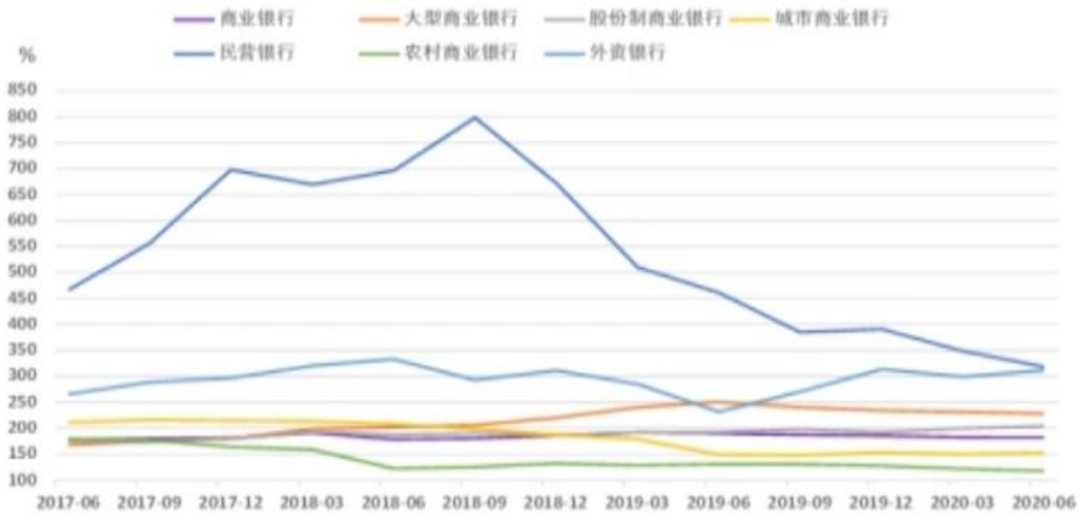


图 10 不同类型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变化趋势

如表 6，2020 年商业银行总体净利润同比下降 2.71%，降至 1.94 万亿，其中，2020 年二、三、四季度当季同比增速分别为 -24.06%、-5.78% 和 24.10%。在二季度商业银行的净利润极度下降之后，三、四季度随着疫情的缓解逐步反弹，与经济基本面的运行趋势是一致的。

表 6 不同类型银行的净利润变化

		净利润（累计值，亿元）						
		商业银行	大型商业银行	股份行	城商行	民营银行	农商行	外资行
201812		18302.00	9573.00	3881.00	2461.00	45.00	2094.00	248.00
201912		19932.00	10606.00	4233.00	2509.00	82.00	2287.00	216.00
202003		6001.00	3083.00	1315.00	766.00	24.00	737.00	76.00
202006		10268.00	5328.00	2188.00	1424.00	43.00	1156.00	128.00
202009		15141.77	8070.01	3276.42	1911.13	64.67	1668.18	151.37
202012		19392.13	10924.57	4106.63	2145.63	92.13	1952.76	170.42
当季同比增速	2020q2	-24.06%	-27.86%	-26.58%	-3.09%	5.56%	-28.01%	36.84%
	2020q3	-5.78%	-0.90%	-4.94%	-16.16%	8.35%	-12.00%	-70.04%
	2020q4	24.10%	60.19%	19.11%	-50.53%	9.84%	-28.86%	-59.47%
累计同比增速	2020q1	5.00%	4.69%	9.40%	-1.16%	26.32%	1.94%	43.40%
	2020q2	-9.41%	-12.04%	-8.49%	-2.06%	16.22%	-11.42%	40.66%
	2020q3	-8.27%	-8.54%	-7.34%	-6.09%	13.46%	-11.60%	-10.43%
	2020q4	-2.71%	3.00%	-2.99%	-14.48%	12.35%	-14.61%	-21.10%
2019年净利润同比增速		8.91%	10.79%	9.07%	1.95%	82.22%	9.22%	-12.90%
2020年变化（亿元）		-539.87	318.57	-126.37	-363.37	10.13	-334.24	-45.58

疫情爆发以来，地方性银行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2020年城商行实现净利润2145.63亿元，同比大幅下降14.48%。从当季同比增速看，2020年后三个季度城商行净利润当季同比分别变化-3.09%、-16.16%和-50.53%，和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行净利润逐季修复不同，城商行净利润同比呈现逐季恶化的典型特征，并没有因为疫情的缓和以及经济的反弹而有所缓解，农商行也呈现同样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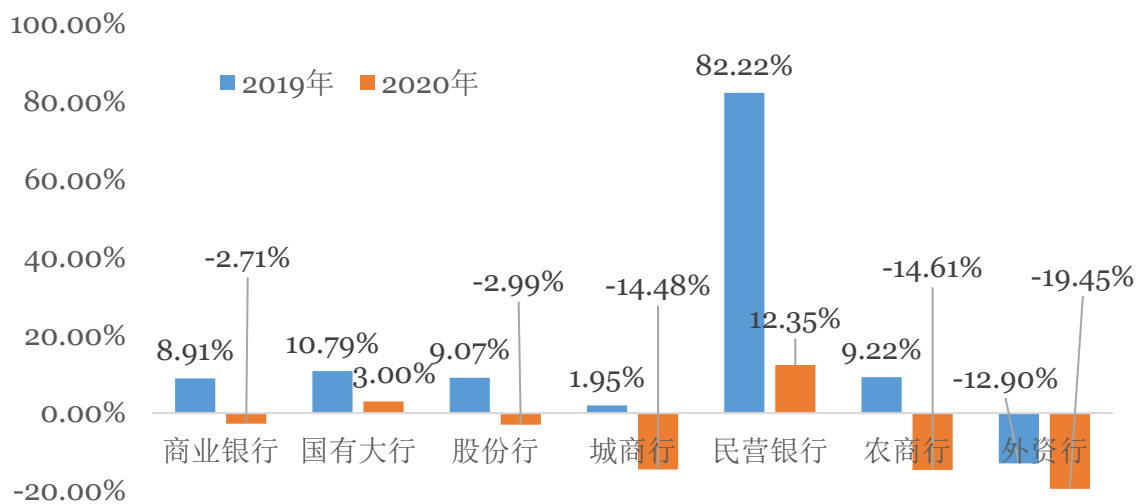


图 11 不同类型银行的净利润当季同比增速

如图 12 比较 2019 年和 2020 年不同类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发现除了民营银行、农商行和外资行出现了下降之外，其他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出现了小幅上升。2020 年城商行资本充足率上升了 0.29 个百分点，达到 12.99%。2020 年底，农商行与民营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12.37% 和 13.53%，分别下降了 0.76 个百分点和 1.62 个百分点。民营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幅度最大。股份行和国有大行分别为 13.60% 和 16.49%，相较于 2019 年的资本充足率都小幅上升了 0.18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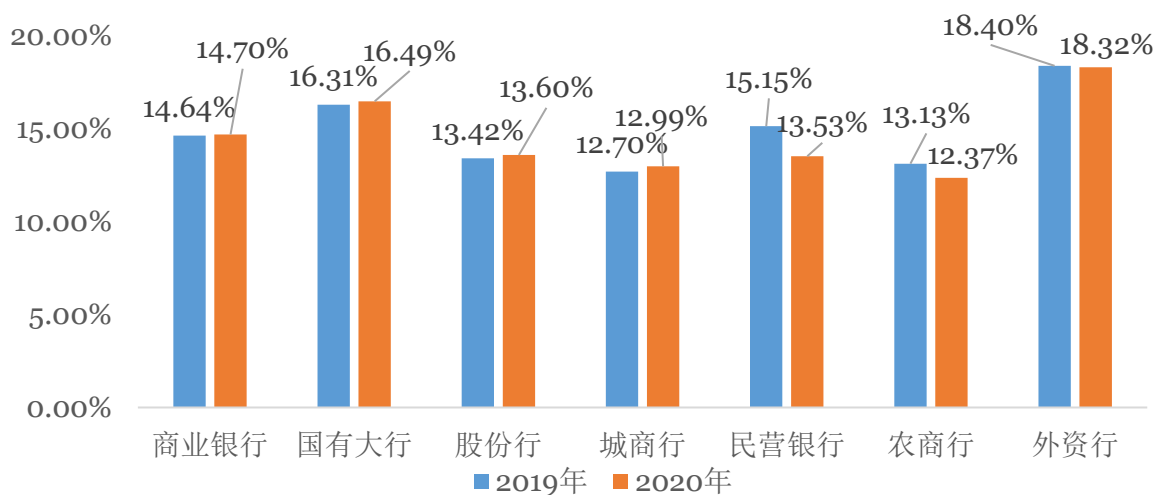


图 12 不同类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变化

### 2.2.2 不良率呈现区域分化

由于城商行资产质量与区域宏观经济、产业发展状况联系紧密，由于疫情对我国经济产业造成结构性冲击，经济复苏存在不平衡的问题，城商行不良贷款也呈现区域不平衡特征。

表 7 各省城商行数量分布

省份	数量	省份	数量	省份	数量
辽宁	15	广西	3	北京	1
山东	14	云南	3	安徽	1
浙江	13	山西	2	海南	1
四川	12	甘肃	2	济南	1
河北	11	贵州	2	青海	1
新疆	6	黑龙江	2	上海	1
广东	5	湖北	2	天津	1
河南	5	湖南	2	西藏	1
福建	4	宁夏	2		
江苏	4	陕西	2		
江西	4	重庆	2		
内蒙古	4				

城商行的地区相对比较密集，虽然每个省级地区至少拥有 1 家城商行，但分布不太均匀，在辽宁、山东、浙江、四川、河北等五个省份占据了半数的城商行，分布拥有 15 家、14 家、13 家、12 家和 11 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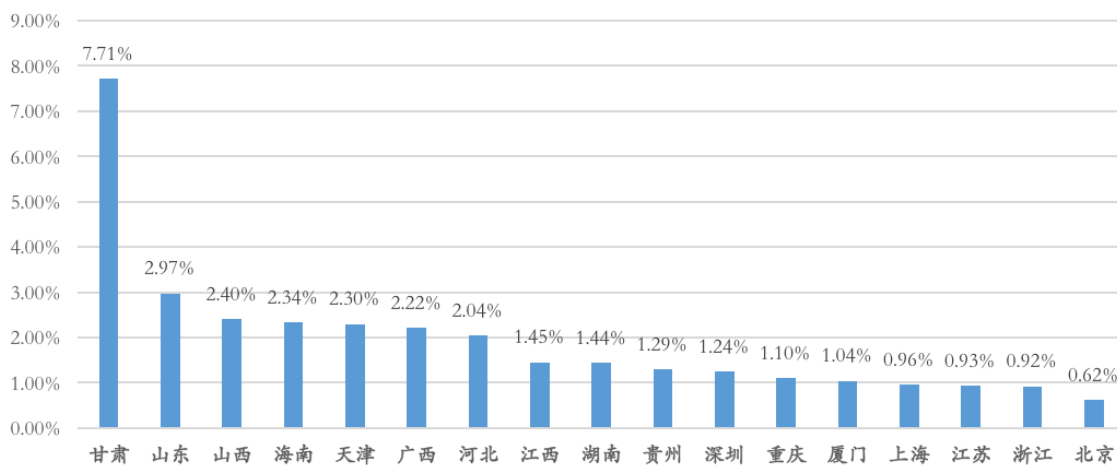


图 13 2020 年 6 月底不同地区银行的不良贷款率



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不同地区的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差异较大，相应的不同地区的城商行不良贷款率的变化也差异较大。数据显示，2020年末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的银行业总体不良贷款率处于1%以内，信用资质较好；甘肃、大连、吉林、天津、黑龙江等北方省市银行业整体不良贷款率水平较高，超出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甘肃、大连和吉林的银行不良贷款率分别高达6.74%、5.49%、3.09%。

如图14所示，看不良率的季度变动幅度，在17个省市地区中，有9个地区的二季度末不良率出现下降趋势，有2个地区（浙江、重庆）保持不变，其他6个地区银行总体不良率呈现增加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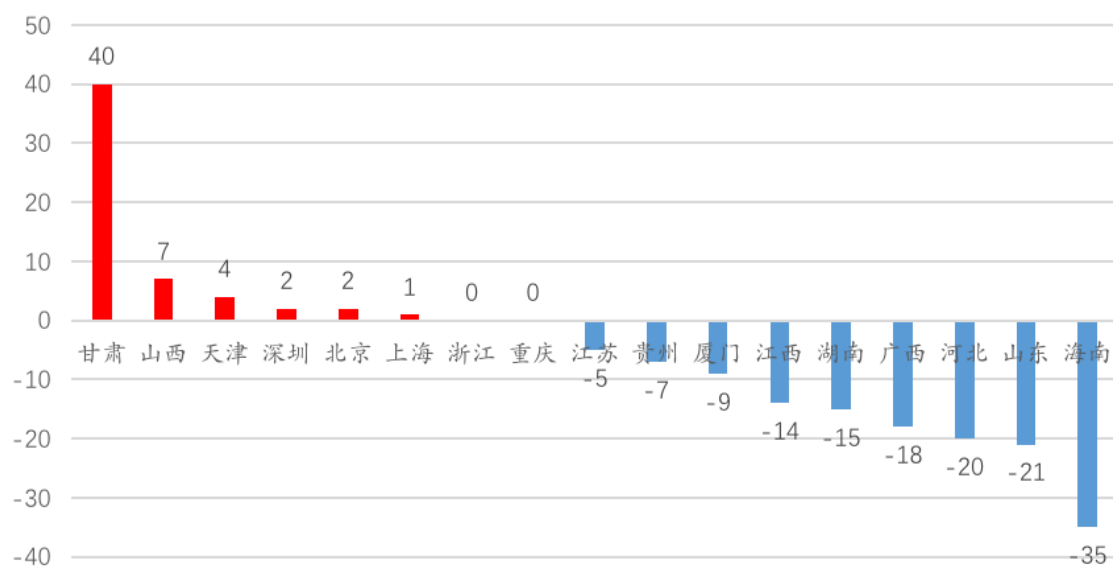


图 14 2020 年 6 月不同地区的不良率变化幅度（单位：bp）

山东、山西、海南、天津、广西、河北等地的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虽然都处于2%-3%区间，但山东、广西、河北、海南等地不良率呈下降趋势，但山西、天津等不良率仍呈现上升态势。江西、湖南、贵州、深圳、重庆和厦门则处于1%至1.5%之间，其中只有深圳的不良率有小幅上升。此外，有11家银行披露了零售不良率，零售不良率的地区分化也

颇为明显。贵阳银行、郑州银行、上海银行不良率位居前三，分别为 2.84%、2.24%、1.12%，其余银行均在 1% 以下，其中成都银行、青岛银行、杭州银行、北京银行低于 0.6%，分别为 0.58%、0.54%、0.45% 和 0.41%。

不同地区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存在差异是一种普遍现象，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资产质量参差不齐，加上不同地区的银行经营管理水平也不同，导致不同地区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面对同一冲击时发生了分化。数据显示，东北、甘肃、天津等地不良贷款风险较高，凸显了我国南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其中，不良贷款率最高的是西北地区的甘肃，甘肃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且第一产业占比很大，以周期性产业为主的甘肃就极易受到疫情等外部环境冲击，甘肃的银行业不良贷款也会随之上升。

### 2.2.3 不良贷款处置加大

随着前期的支持政策的逐步退出，由疫情冲击导致的不良贷款激增的风险进一步暴露是大概率事件。如图 15 中显示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环比增速从一季度攀高之后连续下降，主要原因在于银行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从不良贷款绝对规模以及贷款损失准备金余额等指标变化来看，2020 年四季度不良贷款核销力度较大。2017 年至 2020 年累计处置不良贷款 8.8 万亿元，超过之前 12 年总和。据银保监会统计数据，2020 年全年，中国银行业处置不良贷款 3.02 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当前银行业不良资产认定和处置正在大步推进，2021 年需要处置的不良贷款规模还会继续增长，增势甚至会延续到 202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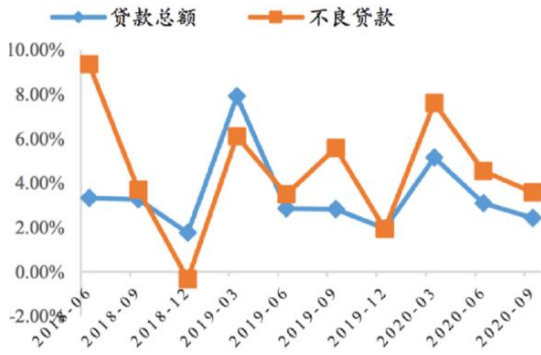


图 15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核销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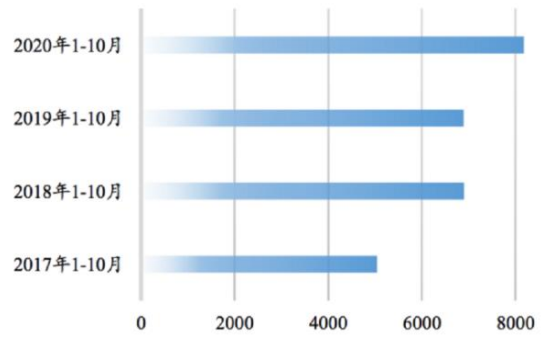


图 16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环比增速

### 第三章 新冠疫情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的影响机制分析

#### 3.1 新冠疫情影响城商行不良贷款的直接路径

疫情冲击下，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不断上升，疫情到底是通过什么途径影响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的，本节将从企业部门、居民部门和银行部门三个维度，分析疫情影响银行信用风险的路径。

##### 3.1.1 企业部门违约风险上升

路径一：新冠疫情--国内经济下行--内需减少---企业利润下降---偿还贷款能力下降---银行不良贷款增多。

在疫情发生之前，我国经济一直处在经济下行的状态，部分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经营不善，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国内外商品和服务需求迅速降低，使得本就经营困难的企业更加举步维艰，直接结果就是无法偿还贷款或者债券债权本息，这导致 2020 年商业银行不良率以及不良余额持续上升。

中小型城商行提供服务的企业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此类企业对资金流转要求高，在疫情中的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往往缺乏足够的现金储备，易形成不良资产。许多原本资金状况良好的中小微企业因为疫情导致短期资金不足，利润下降，偿还贷款的能力下降，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过长，中小微企业难以长期获得资金融通，造成经营困难，从而形成不良资产。因此，疫情通过影响中小微企业的经营情况，危及主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城商行。

从近几年不良资产统计数据来看，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建筑和房地产业等行业不良贷款率较高。传统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建筑和房地产业等行业亟需产业转型升级，疫

情更是加剧了转型压力，不良资产继续在产能过剩行业中积累。比如中低端制造行业受疫情影响国内外需求下降、出口风险增加、融资能力下降、生产经营成本提高等因素影响，部分企业资金链紧张，成为商业银行新增不良资产的主要行业。

路径二：新冠疫情-----投资情绪下降----资产价格下降---抵押品价值下降-----企业融资和经营困难---企业偿还贷款能力下降-----银行不良贷款增多。

此次疫情严重影响我国投资者情绪，投资者情绪下降导致大部分资产价格下降，股票、房地产等抵押品价值缩水，企业融资受限而面临流动性风险，加大经营压力，企业偿还贷款能力下降，银行不良贷款很可能增加。有研究表明，房价与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增速呈现负相关。房价如果下降，以土地和住房资产为主要抵押物的贷款价值萎缩，企业向商业银行贷款的规模相对减少。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贷款余额）的分母降低，不良贷款率就会显示出上升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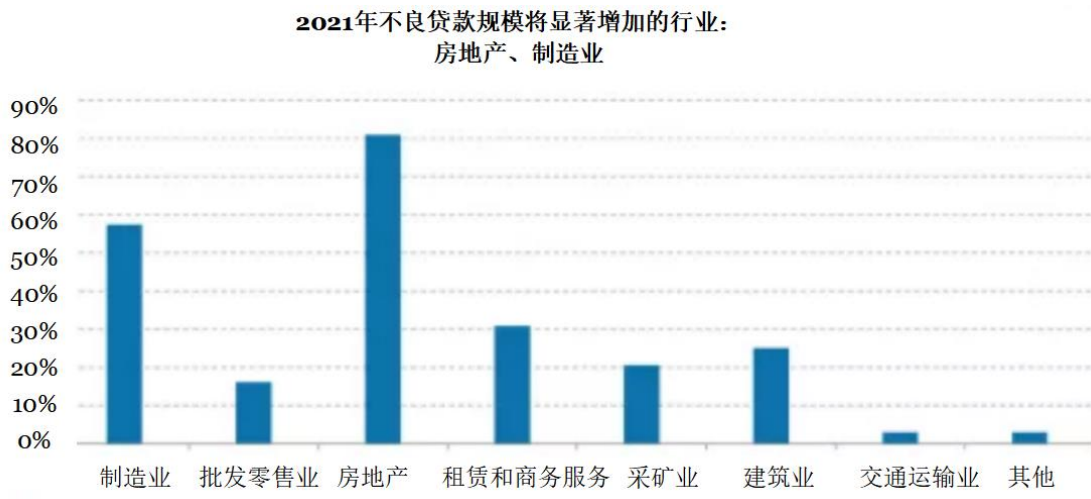


图 17 2021 年不良贷款规模显著增加的行业

房地产行业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近年来在中央“房住不炒”的宏观引导下，各地均加强了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房企（尤其是中小房企）由于难以获得资金融通，造成经营

困难，从而形成地产类不良资产。疫情对于房地产行业影响巨大。由于需求市场萎缩，投资减少，市场的购买能力下降，致使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大幅上升。2021年4月，2021年度《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市场调查报告》认为2021年信用违约风险最突出主体是民营企业与房地产企业。主要面临的风险为地方城投平台违约、房地产企业违约，不良贷款规模将显著增加的行业主要体现在房地产与制造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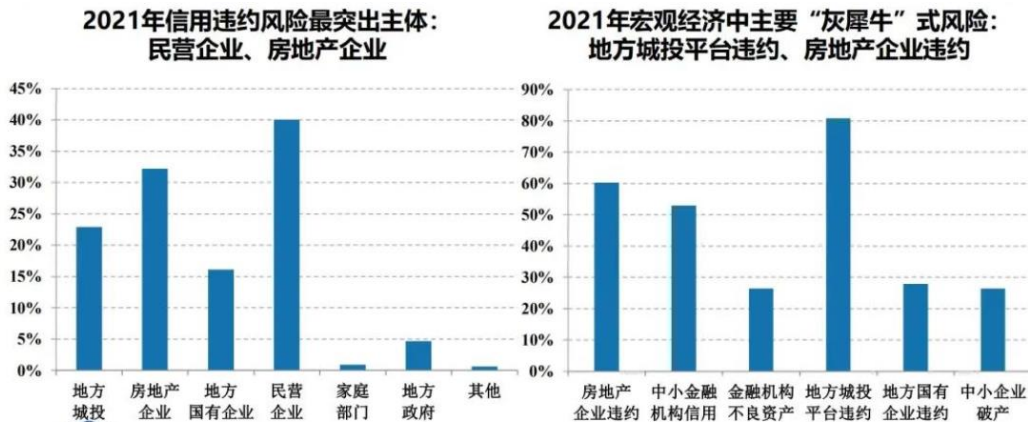


图 18 2021 年主要“灰犀牛”式风险      图 19 2021 年信用违约风险最突出的主体

路径三：海外疫情影响——海外市场需求下降--出口订单萎缩——出口企业艰难——银行抽贷——企业倒闭——坏账爆发。

2018 年以来，中美关系恶化，加之疫情的影响，外贸企业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外国市场消费需求骤减，进出口订单萎缩，商品出口销售渠道受阻，威胁出口企业资金链，从而不能按时偿还银行的贷款，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而且在营收减少和银行抽贷的情况下，企业不能得到及时救助，会引起企业坏账爆发甚至倒闭。

尽管疫情造成国际供需失衡，但是国内经济迅速恢复，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加之新冠疫苗的逐步推广，国内生产生活秩序会逐步回归常态，国内疫情有效控制与国外疫情蔓

延的差异化特征导致了国外对中国商品的较大需求，这将有利于出口保持增长态势，这样有利于缓解外贸企业的经营困难，对外贸企业引发的不良贷款下降。

### 3.1.2 居民部门还贷能力下降

近几年，我国鼓励居民消费以扩大内需，银行也实施了消费贷等促进居民消费的措施，我国居民杠杆率不断攀升。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在 2016 年以来三年间上升了 16.3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升幅超过 4 个百分点。截至 2020 年末，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居民家庭杠杆率在一年时间上升了 6.12 个百分点，达到 62.19%。伴随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居民部分潜在的信用风险也在增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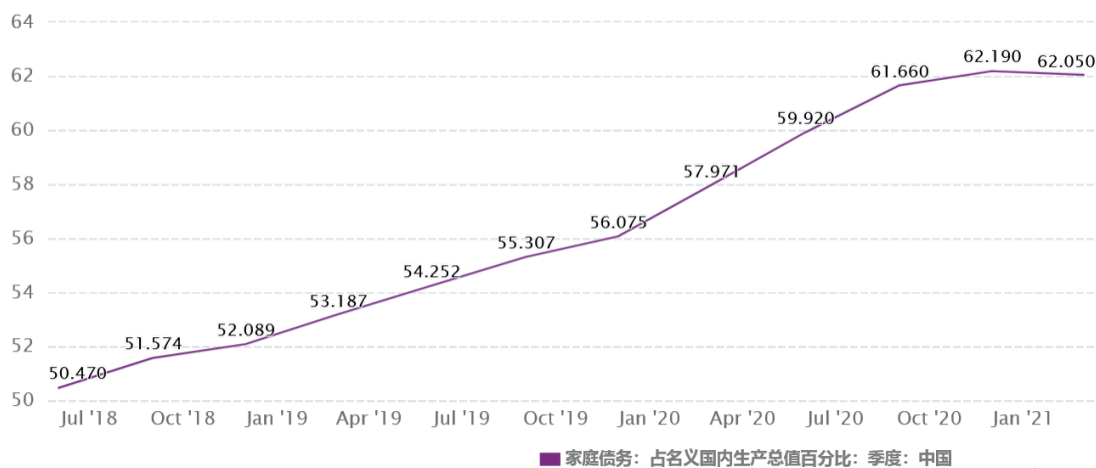


图 20 中国家庭债务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单位：%）

疫情提升了居民各类贷款。从图 21 可以看出，2020 年 2 月居民的各类资产类型产品，包括住房抵押贷款、个人汽车贷款、信用卡分期、一般消费贷等四类，逾期率与 1 月相比有很大程度的提高，特别是一般消费信贷，从 2.8% 增加到了 5.33%，但到了 3 月份，企业和居民开始复工复产，居民的还款能力迅速回复，贷款逾期率开始下降，说明疫情对城商行个人客户贷款的冲击是短期的。但逾期率仍显较高，并没有完全回落至长期的

平均水平，其中住房抵押贷款、个人汽车贷款和一般消费贷款同比增长 61%、55%和 120%，差距较大，这表明居民的还款能力并没有完全恢复，还需要一定的缓冲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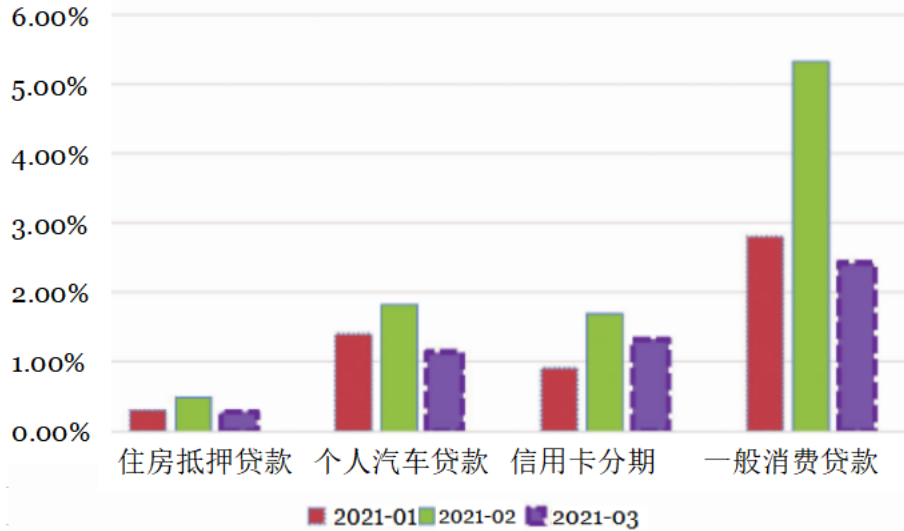


图 21 居民消费贷款 ABS :1-30 天的逾期率（数据来源:cNASS）

疫情使居民消费贷款的早偿率下降。如果居民有足够的还款能力，可能会选择提前还贷款，但从居民消费贷款的月度早偿率来看，2020 年 2 月的早偿率明显低于 1 月，与逾期率类似，月度早偿率自 2020 年 3 月开始好转，相比 2 月有明显提升，

四类个人贷款产品类型中，一般消费贷款的月度早偿率变化最大，从 1 月份的 2.70% 降至 2 月份的 1.64%。3 月份从 1.64% 大幅反弹到了 10.72%，环比上升了 555.26%，但是依然比 2019 年 3 月的早偿水平低，与长期平均水平也存在一定的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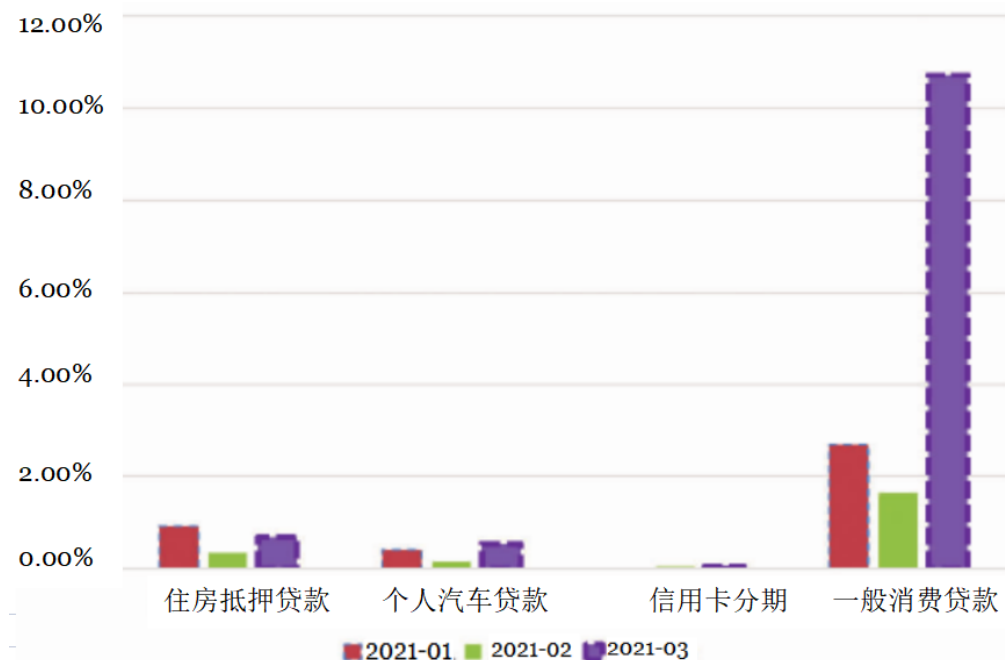


图 22 居民消费贷款月度早偿率（数据来源:cNASs）

路径一：疫情导致社会停摆——失业率急剧上升——个人收入下降——无法偿还银行贷款——逾期上升——不良大幅上升。

我国近年来大力鼓励发展小微企业，但小微企业因其注册资本低、抗风险能力弱，受此次疫情的冲击更大，进而引发失业潮。目前已有许多小微企业裁员，居民失业率急速上升，2020年末，居民失业率在一年的时间上升了0.57个百分点。居民失业导致个人收入下降，降低了还贷能力，但房租、贷款利息等刚性支出仍在，居民信贷逾期上升，最后直接导致银行不良贷款以及不良贷款率双升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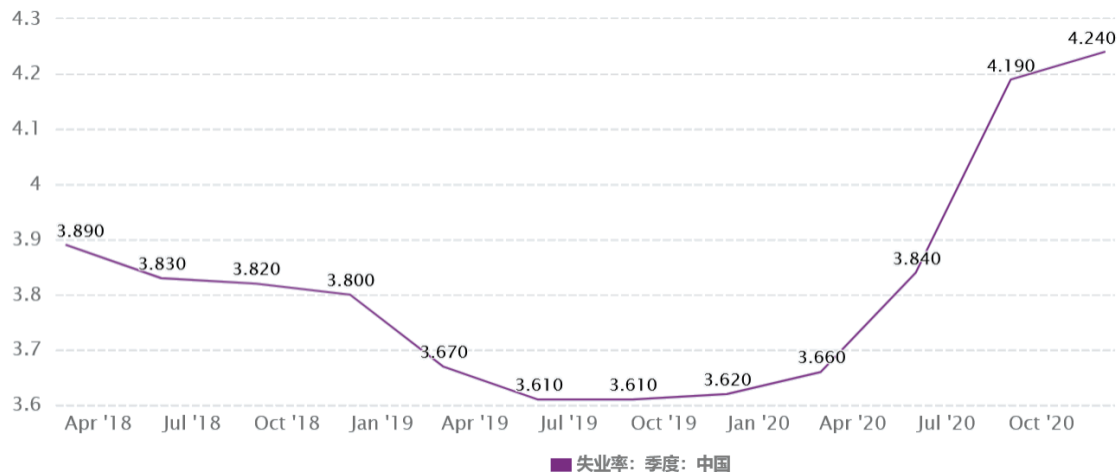


图 23 中国失业率变化

路径二：疫情影响---银行增加个贷规模--居民过度消费---居民还贷压力增加---银行不良风险剧增

我国个人贷款以房贷为主，由于疫情的影响，房价出现下降，因为部分刚需购房者和投资性购房者使用了较高杠杆，在疫情期间经济波动和房地产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出现断供，个人房贷不良持续增加。

个人非住房消费贷款在全部贷款中的比重还有可能上升，城商行把握个人非住房消费市场，通过信用卡、消费贷等方式增加个贷规模，其中不少属于超前消费和非理性消费需求，疫情影响增大了消费者工作和收入的不稳定性，从而造成还款困难。2020 年大多数银行的信用卡发卡量、贷款余额均呈现高增长态势，个别银行的增速甚至超过 80%。

从信用卡发卡量来看，截至 2020 年末，共有 11 家城商行的累计发卡量超过了 100 万张，其中仅有上海银行在去年末发卡量突破千万张，遥遥领先于同业；紧随其后的是广州银行与江苏银行，发卡量分别达到 451.21 万张、412.66 万张。从新增发卡情况来看，天津银行、徽商银行、青岛银行的增幅最为显著，分别达到 84%、66%、56%。其中，天

津银行与青岛银行均为美团联名卡的主要合作方，徽商银行的高增长主要是收购包商银行信用卡业务的结果。

从信用卡贷款余额来看，仅有不到 10 家城商行超过了 100 亿元。截至 2020 年末，广州银行以 712.99 亿元位列榜首，宁波银行也达到了 504 亿元，发卡量最高的上海银行排在第三位，贷款余额为 344.49 亿元。2020 年贷款余额增长最迅猛的是盛京银行，幅度达到 84%；成都银行信用卡的贷款余额也较上年增加了 77%。青岛银行与重庆银行同样增长显著，分别达到 53%、45%。

从信用卡资产质量来看，头部城商行整体表现良好。至 2020 年末，成都银行、宁波银行与重庆银行表现最佳，其信用卡贷款不良率分别为 0.43%、0.97%、1.02%。在披露了该项数据的城商行当中，盛京银行不良率攀升最快。在 2020 年信用卡贷款余额大幅增长 84%的情况下，不良率依然增加了 2.05 个百分点至 4.15%。

路径三：疫情影响---居民居家隔离---业务需求减少---居民收入下降---银行不良增加

疫情期间群众居家隔离，对于人口的流动与人口的聚集有较高的要求的行业，比如建筑施工、餐饮、旅游、交运、娱乐、教育培训等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及消费者的行业，长时间的居家隔离，业务需求减少，延迟复工复产，居民收入下降，银行的居民贷款质量下降风险激增。

### 3.1.3 银行部门盈利能力下降

从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和拨备覆盖率指标来看，拨备计提增加，城商行净利润规模增速在疫情之后持续下降，银行投放资产的规模下降。由于 LPR 引导贷款利率下行、投资资产收益率水平下降等因素影响，银行资产端收益率呈下行趋势，而且负债端成本水平下

降空间有限，信贷资产质量下降，银行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力度随之加大，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利润空间，银行盈利能力呈下行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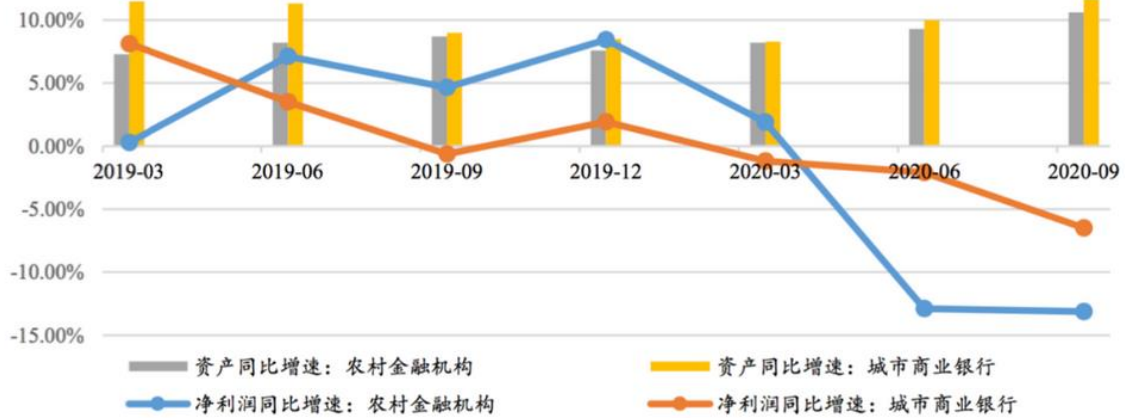


图 24 农村金融机构和城商行的资产同比和净利润同比变化

路径一：疫情影响——银行利润下降——计提拨备的能力会大幅削减——银行资本不足——银行不良处置增加。

在利润下降的情况下，为了符合银行监管的要求，银行想办法降低不良率。在资产质量方面，在监管要求严格划分不良贷款，银行掩藏不良贷款的难度越来越大，所以银行会加大不良处置的力度降低不良率。2020 全年处置不良资产 3.02 万亿元，不良资产处置规模为历年来的最大规模，处置力度也是前所未有之大，未来随着受疫情影响而导致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规模与不良率双升，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压力会逐渐增大，在自行处置和多元化处置不良以外，以不良资产打包出包形式处置的不良规模将有所增加。

单位：亿元，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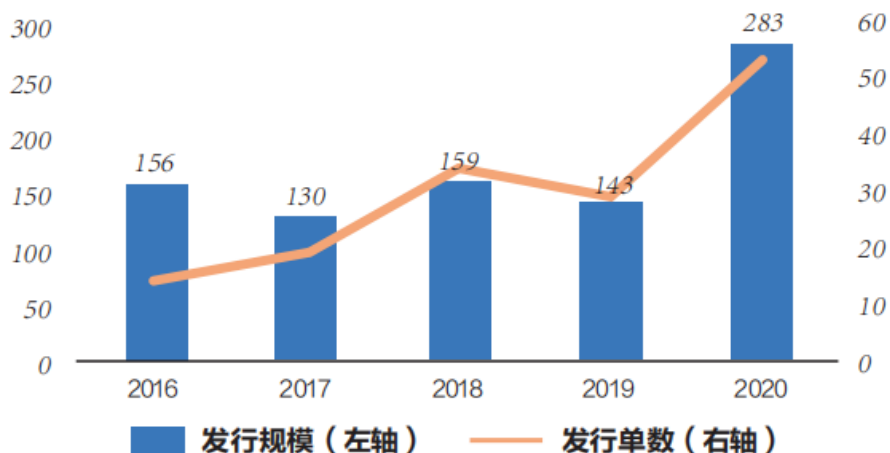


图 25 2016-2020 年不良 ABS 发行单数和规模

如图 25 所示，2020 年不良 ABS 共发行了 55 单，发行单数较 2019 年增加了 26 单，是自 2016 年开始试点以来年度最高发行单数。从发行规模来看，2020 年的不良 ABS 发行规模也是达到了历年之最，总发行规模约为 283 亿元，较去年增长 140 亿元。未来在不良资产规模与不良率双升的压力下，银行将会更多探索传统清收与核销方式以外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不良 ABS 的未来的发行规模有望继续扩大。

路径二：疫情影响——银行放贷谨慎——企业资金收紧——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银行不良增加。

从银行供给方来看，面对疫情后累积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银行的信贷投放态度变得更加谨慎，放贷规模显著低于疫情前的预期，企业资金来源收窄，经营更加困难甚至是倒闭，银行不良增加。

为了防止银行盲目抽贷、断贷、压贷行为，银保监会出台了多项政策举措，鼓励银行加大对受困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2020 年央行推出的“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只是缓解了企业短期经营压力。未来随着政策的退出，这些风险

有可能将集中爆发。即使因疫情影响出现贷款逾期的，在一定的延缓期限内还款不计入不良贷款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不良率仍然在持续攀升。

### 3.2 新冠疫情影响城商行不良贷款的间接路径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外部政策环境转向宽松。在“宽信用”“宽监管”“宽货币”的政策导向下，整个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偏向宽松，但这种政策环境并不利于城商行的转型发展，反而强化了粗放发展的路径依赖，间接的导致不良贷款风险的增加。

#### 3.2.1 “宽信用”政策影响分析

首先，央行多措并举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央行综合运用“全面+定向”降准、提前下达地方政府专项债、发放专项再贷款等方式保障金融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央行还通过减税降费、定向信贷支持和调整还款付息安排等方式，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2020年，银保监会通过督促银行减少收费、支持企业重组和债转股等方式，引导银行让利，这部分让利预计约4200亿元



图 26 中国宏观杠杆率变化

其实，不只是在疫情之后，早在 2019 年初，我国就开始了宽信用政策，如图 26 所示，“宽信用”可以根据宏观杠杆率的变动看出比较明显的周期变化。2019 年一季度，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单季上行 14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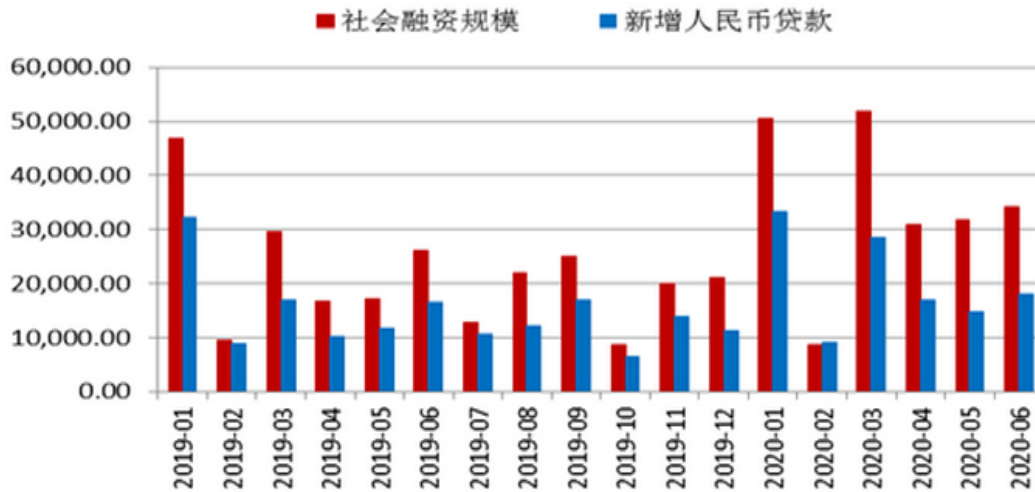


图 27 社会融资总额与新增人民币贷款（亿元）

2020 年 1 月和 3 月社会融资规模和新增人民币贷款激增，二季度也处于高位。如图 27 所示，2020 年 6 月，国内新增社会融资 3.43 万亿元，环比增加 2393 亿元；国内新增信贷 1.81 万亿元，环比多增 3300 亿元。

2020 年一季度主要是企业短贷和企业债券驱动社融的增加，这与债券发行成本较低，以及央行再贷款政策等有关。另外，国内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长显著加快，企业长贷的驱动力有所增强，2020 年 1-4 月，企业长贷对社融的拉动作用是 7.2%。2020 年 6 月政府加大复工复产政策之后，新增企业中长期贷款 7348 亿元，同比、环比分别多增 3595 亿元、2043 亿元，同比增幅创下近 3 年新高。同时，企业信贷结构显著改善，由票据融资及新增企业短期贷款同比分别少增 3065 亿元、357 亿元，信贷结构由短期贷款向长期贷款转

变。截止 2020 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对 7.3 万亿元贷款本息实施延期，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 3.9 万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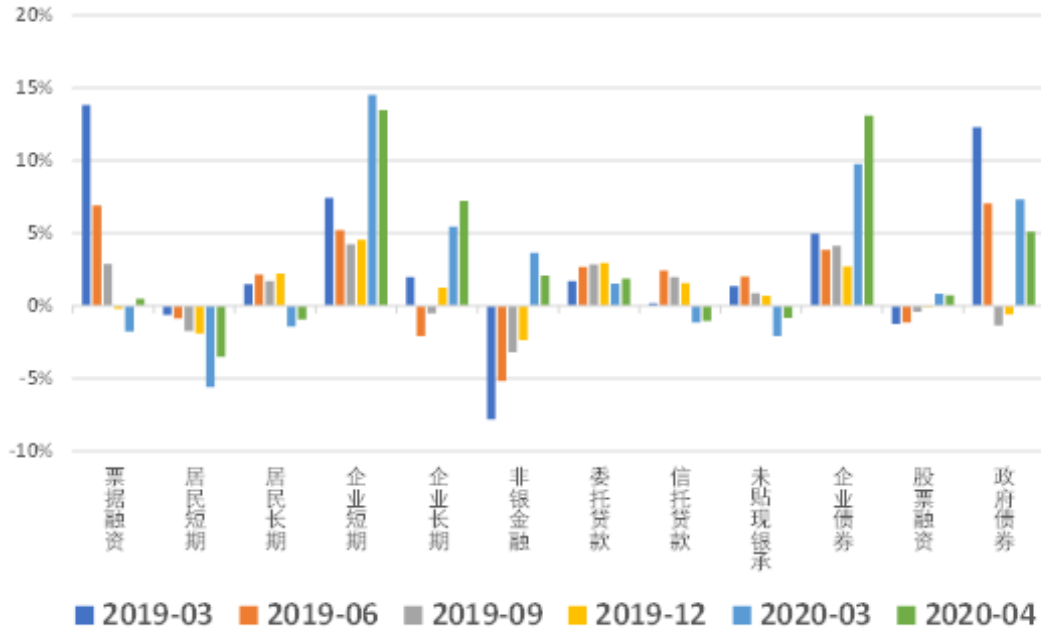


图 28 新增社融种类变化（亿元）

对一般贷款利率和新增贷款做了季节性调整，如图 29 所示，可以看到，新增贷款的增长与贷款利率的下行密不可分，2020 年 6 月左右，贷款利率已经触底，对信用扩张的驱动见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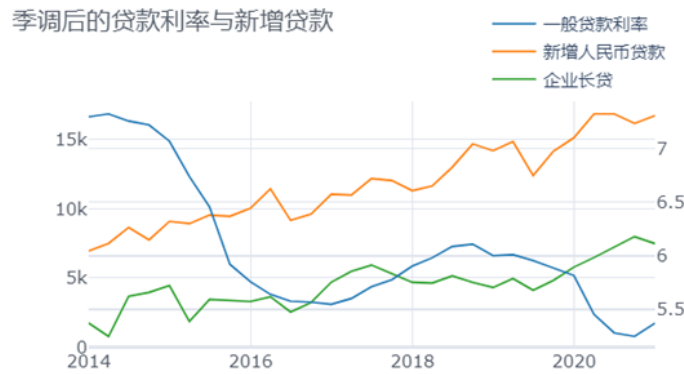


图 29 季调后的贷款利率和新增贷款



城商行在内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除了加大信贷支持，还下调相关企业贷款利率甚至免除部分利息，为重点中小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利率，对新普惠性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降了0.5个百分点，虽然这些“宽信用”政策有利于缓解疫情，但使城商行净息差减少，压缩银行利润空间。在宽信用政策的导向下，银行承担着派生信用的职能，很多城商行整体资产规模持续增长，部分中小银行出现了同业加杠杆的迹象，同时为了吸收存款加大稳定性较差的存款资金，易使银行面临的流动性风险有所上升。与此同时，部分商业银行逾期贷款规模显著增加，而且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弱，一定程度上可能对城商行未来资产质量带来下行压力。2021年将进入地产企业的偿债高峰，这使得未来房地产企业将承受更大的现金流压力，偿债压力尤其显著，需警惕由此带来的信用违约风险，三条红线又带来地产行业的洗牌。预计未来各类型不良资产规模将有一定幅度增长。

### 3.2.2 “宽监管”政策影响分析

为缓解疫情冲击，监管部门也对资管新规执行和不良贷款容忍度给予一定的宽限。监管机构积极鼓励银行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做延期、续贷，以及加大对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等。但考虑到中小银行信贷规模相对较小，2020年6月，监管发文下调中小银行拨备率，因此城商行银行腾出更多的信贷资源，促使城商行增加了贷款规模。

考虑到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金融带来的冲击，有关部门决定将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至2021年底，继续对因特殊困难而难以处置的存量资产做适当安排，即“一行一策”。这种政策放松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城商行留下了隐患，很可能因资管新规政策放松引发道德风险。

一方面，由于过渡期延迟预期、新产品发行较难等原因，城商行不会率先牺牲市场份额来完成转型。很多城商行并不能在 2020 年底完成存量资产规范整改。另一方面，“一行一策”的政策可能会使城银行面临不同的整改进度要求、不公平的竞争待遇以及更高成本的监管套利，也有可能带来更多的监管寻租，既增加监管成本，也不利于市场公平竞争。

近几年监管部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做实贷款分类、加大不良贷款处置。2020 年 2 月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表示将充分考虑疫情的客观影响，适度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为应对疫情，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方监管机构也相继要求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对于城商行而言，不良贷款容忍度放松很可能引发城商行的道德风险，直接影响到其贷款质量和经营水平。

### 3.2.3 “宽货币”政策影响分析

2020 年疫情爆发后以来，央行持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连续三批次出台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分别是 1 月 31 日春节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安排 3000 亿元专项再贷款；2 月 26 日，新增再贷款再贴现额度 5000 亿元；4 月 20 日，再次新增再贷款再贴现额度 1 万亿元。还积极引导中期借贷便利（MLF）和 LPR 下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为实体企业提供流动性支持，特别是支持小微企业的生产与经营。监管层鼓励银行放贷实体经济，大幅下调无风险利率，并将 1 年期 LPR 从 4.15% 下调至 3.85%，把 5 年期 LPR 从 4.80% 下调到 4.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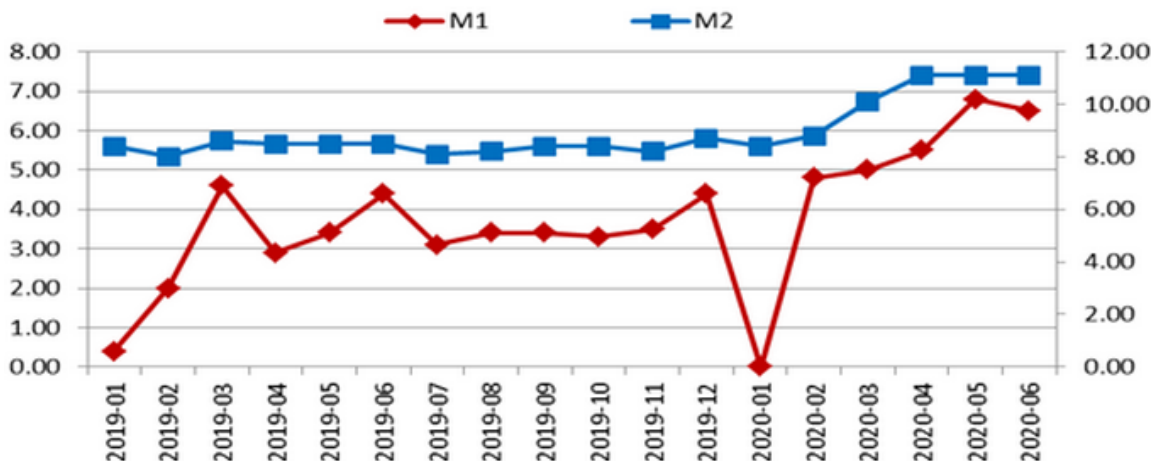


图 30 我国基础货币增速

实际上，实行宽松货币政策，货币供给增加，短期内，货币充裕对于掩盖商业银行不良率、提高资本充足率有利，但长期看，货币供给过多会导致通货膨胀，在金融市场上导致资产价格泡沫。一旦货币政策发生逆转，将会致银行信用资质缩水。从经济总量上看，经济增速已经回升到了潜在增速上方，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为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埋下巨大隐患。特别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新常态时期，对于产能过剩亟需转型的产业，企业营业收入普遍下滑严重，由宽货币引起企业盲目投资和生产，无法按时收回银行贷款的话，银行信贷资产将受到新一轮冲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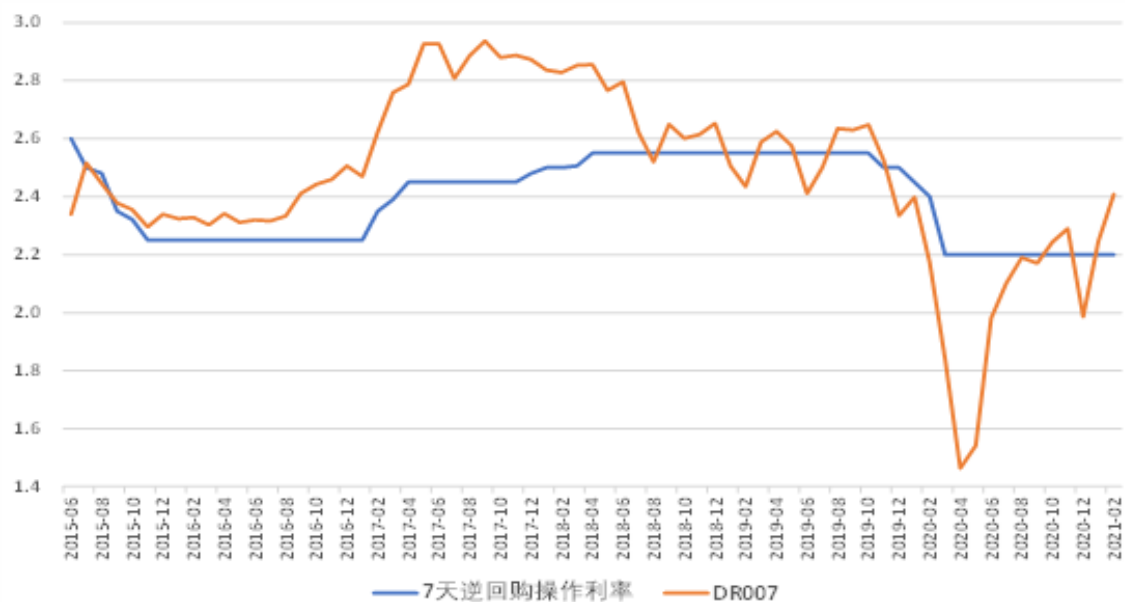


图 31 7 天逆回购操作利率变化

截止 2020 年三季度，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从 5.44% 下降至 5.12%，其中企业贷款利率低至 4.63%。如果我国长期实行偏低的政策利率水平，可能会引起金融市场过度加杠杆，资金空转套利，可以在维持政策利率平稳的情况下，引导市场利率适度波动，防止包括城商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会通过加杠杆方式进行套利，禁止本应该投入实体经济的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

## 第四章 新冠疫情影响上市城商行不良贷款的实证研究

### 4.1 研究假设与模型介绍

#### 4.1.1 研究假设

##### (一)新冠疫情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

在疫情发生初期，部分周期性、受外界环境影响较大、风险抵御程度更低的企业最先受到冲击，城商行资产质量承压，但在初期还未形成大量的不良贷款；随着疫情的全面爆发，企业、居民等部门还贷能力受到严重影响，不良贷款加速暴露，不良贷款率迅速上升，所以不良贷款的传导是有时滞的。但随着“三宽”政策进程不断推进，城商行信贷规模增加，不良处置加大，不良贷款率有所恢复，但总体来讲疫情对银行不良贷款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1:

**H1:**疫情提升了上市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并存在时滞性。

##### (二)疫情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率的异质性影响

由于历史和改革开放进程等原因，各城商行的发展程度不平衡，面对疫情带来的冲击的抵御能力也不同，而本身利润较低、拨备覆盖率低的城商行处理疫情带来的不良风险的能力也不足，经营状况难以迅速得到改善。所以，本文提出假说 2:

**H2:**相比高拨备覆盖率的城市商业银行，疫情更能提高低拨备覆盖率的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

在应对疫情这种重大突发事件时，城市的基础设施完善度、资金能力等因素决定了控制疫情的速度，比如重庆、北京、上海和天津等经济基础较为发达的城市在疫情应对方面

反应较快，执行力较强，企业、居民可以迅速的复工复产，缓解了银行还款压力，城商行的资产质量受到疫情冲击就会越小。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3:

**H3:**疫情更能提高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

#### 4.1.2 模型介绍

由于新冠疫情的发生是一个黑天鹅事件，对于一个城商行而言是一个外生的冲击。事件分析法和双重差分法都可以用来估计某一事件的发生造成的影响，只要有一个外生冲击使得我们的被解释变量  $y$  在两个维度发生变化，其实就可以考虑 DID。这两个维度一般都是时间维度和地区维度，并且这两个维度一般都用 0-1 变量刻画。所以，在传统的 DID 模型中，地区维度的政策分组变量  $treat$  和时间维度的政策时间变量  $period$  都是二值虚拟变量，交互项  $treat \times period$  的系数反映的就是经过冲击发生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两次差分后所得到的政策效应。

但是，这种设定仅仅体现的是地区维度有和无的区别、冲击发生与未发生的区别，无法体现出程度的变化。有些情况下，不同个体受外生冲击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地区（个体）维度的变化并不是从 0 到 1 的变化，而是一种连续型的变化。根据这一思想，我们其实可以将地区（个体）维度的政策分组虚拟变量替换为一个连续型变量，用以反映程度的变化，从而也就衍生出了一种新的 DID 模型——连续型 DID。

本文在以往文献对于城商行不良贷款率决定因素的研究的基础上，参考 Nunn 和 Qian（2011）的建模方法，借助以下连续型双重差分模型衡量新冠疫情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该模型公式如下：

$$Non - performing\ loan\ ratio_{it} = \alpha_0 + \alpha_1 post_t \times degree_i + \alpha_2 Controls_{it} + \lambda_i + \nu_t + \varepsilon_{it}$$

其中： $post$  为疫情冲击的时间虚拟变量， $degree$  为疫情严重程度衡量指标，其相乘的系数大小表示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疫情严重程度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率带来的影响。模型同时控制不良贷款率的其他影响因素：地区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人均收入等（将在下一节指标选取中详细说明），以及体现城商行不良贷款率惯性趋势的滞后一期的不良贷款率。考虑到城商行不良贷款率还可能受到春节等季节性因素的影响，上述模型将时间固定效应以及个体固定效应分离出来，更为精确地反映了时间特征以及个体特征，进行更为细致的固定效应控制。

连续型 DID 模型更加灵活且便于理解，适用于疫情这种外生冲击的实验。并且该模型使用双向固定效应估计，避免了遗漏变量导致的偏误问题，能够有效避免内生性的问题，有利于本文后续进一步的影响机制的验证以及稳健性检验。

#### 4.1.3 指标选取

NPLR (Non-Performing Loan ratio) 不良贷款率是被解释变量，利用城商行不良贷款/贷款总额计算得出。 $Post$  是疫情爆发时间虚拟变量，在 2020 年之前的样本取 0，2020 年之后的样本取 1。 $degree_i$  是疫情严重程度，为连续型变量。在该指标构建时，利用了变量标准化的特点，按照极差归一化的数据标准化方法能够将变量转换为 0 到 1 的数值，同时充分体现了严重程度。本文选取新冠患病人数累计值作为原始指标，考虑到城商行的经营范围界定城商行受疫情影响程度，由城商行所在的省或直辖市的患病累计人数来决定，比如北京银行就是北京的疫情人人数累计数，杭州银行是浙江的疫情人人数累计数，以其归一化之后的值代表遭受疫情冲击的严重程度。在连续型 DID 模型中，交互项  $Post*degree$  的系数反映的就是疫情发生所带来的不良贷款在疫情程度上的异质性，为本文的重点观测估

计量，体现了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疫情严重程度的不同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率带来的净效应。如果系数为正，那就说明疫情越严重，疫情带来的不良贷款上升的效应会越大。

根据第二章和第三章城商行不良贷款的成因和影响路径分析，选取 2018 年一季度至 2020 年四季度的 9 个经济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分成宏观、行业和银行等三个层次。由于只有上市城商行发布了不良贷款率，考虑数据的可得性，选取 20 家上市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不良贷款率是衡量银行资产质量的指标，为了使回归结果更科学，分别选取了银行风险抵补性和盈利性方面的两方面的相关指标，也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8 变量解释

层次	变量	符号	单位	变量解释	
被解释变量	因变量	不良贷款率	NPLR	%	不良贷款/贷款总额
解释变量	交乘项		Post*degree	无	2020 年前后虚拟变量与程度连续变量的交乘项
	动态效应交乘项		Post1*degree	无	2020 年一季度前后虚拟变量与程度连续变量的交乘项
	动态效应交乘项		Post2*degree	无	2020 年二季度前后虚拟变量与程度连续变量的交乘项
控制变量	宏观	国内生产总值	GDP	%	GDP 季度增速
		信贷约束	M2/GDP	%	货币供应量季度增速/GDP
		消费物价指数	CPI	%	消费物价指数增速
		生产价格指数增速	PPI	%	生产价格增速
		利率	Rate	%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
	行业	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	ESTATE	%	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速
	银行	滞后一期的不良贷款率	NPLA1	%	滞后一期的不良贷款率
		存贷比	DLR	%	贷款总额/存款总额
		拨备覆盖率	PCR	%	(一般准备+专项准备+特项准备)/不良贷款总额
		资本充足率	CAR	%	资本/风险调整后的资产总额

为了研究新冠疫情对于城商行不良贷款的影响，本文选择 2018 年第一季度到 2020 年第四季度的数据，具体包括有关城商行不良贷款、疫情状况、控制变量包含的指标数据，以省级行政区域为截面。数据来源于 CEIC、WIND 数据库。最终得到 12 个时间节点上 20 家银行的数据，即 240 个样本数据，构成一个平衡面板数据。

## 4.2 实证分析

### 4.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9 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城商行之间的不良贷款率差别比较大。利率水平 Rate 的平均值为 3.147%，统计结果显示不同时期利率水平变化较大。在样本期间，通货膨胀率 CPI 差别比较小，说明物价比较平稳。信贷约束 M2/GDP 的均值为 8.051，且不同时期的信贷约束差距很大，由此也会产生相应的不良贷款率的差异，这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表 9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误差	最小值	最大值
NPLR	1.380	0.336	0.780	2.470
Degree	0.008	0.080	0.000	1.000
GDP	0.064	0.069	-0.177	0.251
M2/GDP	8.051	0.816	7.000	9.902
CPI	102.555	1.099	100.833	106.267
PPI	0.464	2.463	-3.700	4.700
ESTATE	0.075	0.093	-0.166	0.357
Rate	3.147	0.635	1.860	4.303
DLR	3.697	0.608	2.530	5.620
PCR	284.492	90.467	150.420	525.490
CAR	13.797	1.267	11.120	17.910

#### 4.2.2 疫情对上市城商行不良贷款的影响

为了分析新冠疫情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的影响，首先将不良贷款率和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再逐一引入交乘项进行回归分析，连续型 DID 模型同时控制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最终的回归结果中如下表 9 所示，其中第（1）列只包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2）、（3）、（4）列是引入交乘项后的回归结果，其系数反映了动态效应。

表 10 实证结果

变量	(1)	(2)	(3)	(4)
	NPLR	NPLR	NPLR	NPLR
Post*degree		0.0674*** (0.0066)		
Post1*degree			0.0452*** (0.0059)	
Post2*degree				0.0702*** (0.0086)
GDP	-0.0103*** (0.0025)	-0.0174*** (0.0019)	-0.0114*** (0.0021)	-0.0152*** (0.0023)
M2/GDP	0.163*** (0.062)	0.172*** (0.053)	0.121*** (0.097)	0.167*** (0.068)
CPI	0.003 (0.025)	0.006 (0.031)	0.015 (0.088)	0.005 (0.034)
PPI	0.008* (0.0007)	0.009* (0.0006)	0.008* (0.0009)	0.007* (0.0007)
ESTATE	-0.231 (0.189)	-0.291 (0.192)	-0.318 (0.252)	-0.274 (0.199)
Rate	-0.164 (0.121)	-0.211 (0.138)	-0.238 (0.164)	-0.192 (0.143)

变量	(1)	(2)	(3)	(4)
	NPLR	NPLR	NPLR	NPLR
NPLA1	0.421***	0.413***	0.382***	0.402***
	-0.019	-0.014	-0.009	-0.011
DLR	-0.003*	-0.005	-0.005	-0.004
	(0.0011)	(0.0073)	(0.0078)	(0.0064)
PCR	-0.214***	-0.236***	-0.227***	-0.291***
	(0.081)	(0.101)	(0.093)	(0.096)
	(0.0019)	(0.026)	(0.0054)	(0.0007)
CAR	0.143**	0.185**	0.176**	0.190**
	(0.068)	(0.093)	(0.088)	(0.061)
Constant	-2.31	-2.35	-2.52	-2.766
	(1.629)	(1.633)	(1.771)	(1.839)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sq	0.61	0.64	0.64	0.63

注：“\*”、“\*\*”、“\*\*\*”分别代表在 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从第（2）列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受疫情冲击越严重的地区，经济受影响越明显，因而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增加得越多，滞后一期的不良贷款率的系数为正，假说 1 疫情提升了城商行不良贷款率，且具有时滞性是成立的。通过观测逐一加入交乘项所描述的动态效应可以知道，疫情冲击更严重的地区不良贷款增加更多的情况，在 2020 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都是显著存在的，说明新冠疫情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在实证结果中拨备覆盖率的系数为负，而且加入疫情因素之后，系数绝对值比没有疫情因素的实证组（1）更大，说明拨备覆盖率和不良贷款率的关系是

相反的，且本身利润较低、拨备覆盖率低的城商行处理疫情带来的不良风险的能力也不足，不良贷款率更大，所以假设 2：相比高拨备覆盖率的城市商业银行，疫情更能提高低拨备覆盖率的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成立。同理，地区经济增长的系数也为负，而且加入疫情因素之后，系数绝对值比没有疫情因素的实证组（1）更大，说明经济较好的地区，疫情发生后不良贷款率是相对较小的，以此证明假设 3 成立。

#### 4.2.3 稳定性检验

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不良贷款率，2020 年宽信用环境导致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大幅增加，还有货币宽松等刺激以及延期还本付息、核销力度加大等政策因素影响，使得不良贷款率不增反降，使得不良贷款率的纵向参考价值整体不是很高，拨备覆盖率也多有提升。为了研究新冠疫情对城商行资产质量风险的影响，需要通过对其他指标进行稳健性分析，选取银行资本充足率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从新的结果可以看到，受灾越严重的城商行资本充足率越低，并且这种影响在 2020 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都是成立的，由此可见结论是稳健的。

表 11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CAR	CAR	CAR	CAR
Post*degree		-0.032** (0.0016)		
Post1*degree			-0.027*** (0.0012)	
Post2*degree				-0.019** (0.002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sq	0.42	0.45	0.46	0.41

#### 4.2.4 影响机制检验

利用引入交乘项的方式，进一步探讨新冠疫情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的影响机制，方程如下：

$$NPLA_{it} = \alpha_0 + \alpha_1 post_t \times degree_i + \alpha_2 post_t \times degree_i \times channel_{it} + \alpha_3 channel_{it} + \alpha_4 Control_{it} + \lambda_i + \nu_t + \epsilon_{it}$$

其中 *channel* 为疫情影响城商行不良贷款的渠道变量。

在第三章分析了疫情影响城商行不良贷款的几个路径：第一，疫情爆发之后，企业融资受限而面临流动性风险，加大经营压力，企业偿还贷款能力下降，银行不良贷款很可能增加，因此引入工业增加值（IVA）作为渠道一。

第二，疫情导致社会停摆，失业率急剧上升，个人收入下降——偿还银行贷款的能力下降，个贷逾期上升，城商行不良大幅上升。因此引入居民人均收入（PCI）作为第二个渠道变量。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工业增加值和居民人均收入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工业增加值和居民人均收入对城商行不良贷款有负向的影响，即工业增加值上升以及居民收入上升时，城商行不良贷款率将会下降。同时通过路径与疫情的交乘项可以看出，在疫情冲击后，受灾程度更大的地区其工业增加值和居民人均收入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的负向影响更大，两个指数的下降将使城商行不良贷款率产生更大幅度的上升，由此可见企业和居民两个渠道的影响是显著的。

表 12 新冠疫情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的影响路径检验

变量	(1)	(2)
	NPLR	NPLR
Post*degree	0.432*** (0.021)	0.457*** (0.027)
Post1*degree*IVA	-0.0029*** (0.0008)	
Post1*degree*PCI		-0.0082*** (0.002)
IVA	-0.035*** (0.0031)	
PCI		-0.092*** (0.008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R-sq	0.64	0.64



## 第五章 后疫情时代下城商行不良贷款处置与防范

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速呈现放缓并趋下行走势，加之疫情的影响，这一状况在短中期内不大可能扭转。在此背景下，城商行不良资产的积累程度与暴露量级预计会有所增加。如何稳妥处置好存量和新增的不良资产，切实化解地方金融风险，为地方经济稳定发挥积极作用，是不良资产市场参与者的责任与使命。

城商行面临两大任务，一方面，要持续开展不良资产清收处置工作，达到资产回收最大化；另一方面加强资产质量管控，防范不良风险。

### 5.1 后疫情时代下城商行不良贷款处置

疫情之后，随着不良资产的压力逐步增大，监管部门也在着力推动商业银行拓宽不良资产处置渠道和加大处置力度。如表 12，从 2019 年以来，关于不良资产处置的政策信息也较为集中且政策方向上趋于宽松。据银保监会在 2021 年 3 月 2 日公开披露数据显示，2017 年至 2020 年累计处置不良贷款 8.8 万亿元，超过之前 12 年总和。在大中型企业债务风险平稳处置方面，到 2020 年末，全国组建债委会 2 万家，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落地金额 1.6 万亿元，500 多家大中型企业实施联合授信试点。

虽然不良资产的处置达到了一定效果，但由于全国不良资产的规模扩大，其不良贷款的消化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商业银行必须提高自身的不良资产处置能力。一方面要不断丰富不良处置手段，采用金融科技开拓核销、催收、资产证券化、债转股、个贷不良批量转让等新的方式缓释风险；另一方面要优化不良贷款管理机制，通过内部的日常清收处置管理补充银行资本金，提高拨备覆盖率，需增厚风险缓冲垫，增强自身风险抵补能力。

表 13 关于不良贷款处置的政策

时间	具体政策消息
20191129	<p>央行等监管部门召集银行等金融机构开会，再次扩大不良资产证券化的试点范围（第一批试点为 2016 年 2 月的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和招行;第二批试点为 2017 年 4 月的民生、兴业、华夏、江苏、浦发和浙商银行;第三批试点为 2019 年 11 月扩大至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邮储银行、进出口银行、渣打银行（中国）、贵阳银行、青岛银行、东莞银行、广州农商行、深圳农商行、顺德农商行、重庆农商行等）。</p>
20200602	<p>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在"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受到影响也是必然的.....要求在今年未来的三个季度商业银行需要加大拨备提取。为防止今年、明年甚至后年信贷资产质量下降，我们要做好准备"</p>
20200614	<p>银保监会印发《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和《银行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两份文件。</p>
20200616	<p>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联合多部门发布《外资资管机构北京发展指南》，探索以符合条件的交易场所为平台，在北京开展银行不良资产跨境转让业务试点。</p>
20200616	<p>四川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人行成都分行、四川银保监局、四川省高院、四川省公安厅、四川省财政厅和四川省国税，局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支持金融机构加快不良资产处置若干措施》</p>
20200619	<p>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新闻发言人肖远企称，拟放开单户对公不良贷款和批量个人不良贷款的转让，准备推出试点，并在经验成熟后，逐步放宽试点范</p>

### 5.1.1 探索多种方式开展不良资产清收处置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处置主要依赖于四家全国性的资产管理公司（AMC），不良处置分为传统方式和新兴方式两部分，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加之外部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大，传统处置方式风光不再，要加强金融科技在不良资产领域的应用。易居牵手阿里共建的房产数字化平台，360PAI的找律师，淘特资的智能估值报告都展现出了科技与行业的融合。通过发挥科技手段的市场价值发现功能，减少债权债务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打通AMC、投资者、中介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屏障，对不良资产进行合理优化配置，这可以较好的提升不良资产处置效率。这些金融科技手段也推动了不良资产标准化的步伐，甚至可以说谁具有这些金融科技能力谁及有可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得优势，目前来看，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科技型公司，并且还有很多AMC也在向这个方向迈进，数字资产管理公司已经成为很多机构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之一。未来不良资产行业与金融科技的融合程度会不断加深，当然金融科技本质上是辅助手段，真实的处置能力以及行业生态圈等从业者的自身要素还是最为重要的因素，这是在今后“不良+科技”应用中所要注意的加强对不良贷款形成的原因分析，向信贷业务的开发、日常管理维护等环节提供经验教训，为信贷业务拓展工作的持续改进发挥作用。

### 5.1.2 优化不良贷款清收处置管理机制

城商行要采取更审慎的财务会计制度，做实资产分类，充分暴露不良资产。日常监管上，不简单将不良率上升作为评判标准；要利用拨备监管要求下调腾出的财务空间，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制定切合实际的收入和利润计划，增加拨备计提和资本补充；疏通不良资产处置的政策堵点，为提高金融体系稳健性创造更有利条件。

当前，不少城商行设立了专门的资产保全部门，负责处理不良贷款。针对这种集中清收模式，要进一步提升其专业化水平，对现有管理制度，尤其是考核激励机制进行优化，形成更加完善的专业化制度体系，充分体现集中处置模式的专业化优势。

对于不良资产行业来说，监管也在逐渐加强，从《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不良贷款转让业务规则（试行）》可以看出个贷和单户不良资产转让进入了统一交易场所与规则的范畴，这也是真正意义上全国性不良资产转让交易平台，未来是否会延伸到批量转让业务，还要拭目以待。总之合规化经营是未来顺应监管的长久之策。

## 5.2 后疫情时代下城商行不良贷款的风险防范

### 5.2.1 注重表内外资金统筹管理与优化

城商行的强弱，跟区域资源禀赋密切相关，深耕本地、做好对公，是区域性银行立身的根本。近两年来，政策引导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产业升级，也为中小银行带来大量对公业务机会。这就需要中小银行聚焦主业，结合自身优势，打造特色化的经营策略。

“大资管”时代，客户资金进入银行的渠道逐渐多元化，城商行应引入并不断完善客户金融资产管理模式，实现覆盖存款、理财及同业资金等表内外负债的资金统筹管理。

一方面，坚持客户存款的核心地位、基础地位不动摇，努力拓展低成本资金来源，提高核心负债的占比。不仅要通过产品创新和服务提升，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提高客户粘性与资金稳定性，主动改善被动负债的可控性；还要通过存款定价管理的强化，严格控制资金成本。

另一方面，在保持一般性存款稳定的前提下，从分散负债来源、稳定负债结构、控制负债成本入手，综合考虑发展战略导向、资产负债规模与结构、经营发展目标，积极推进

主动负债管理，利用大额存单、债券发行等市场化的融资工具，实现资金来源的多样化，同时吸收稳定性好、成本低同业资金满足流动性需要。

### 5.2.2 着力深化客户聚焦及特色化发展

随着银行业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各种经营模式、思路的相互碰撞，城商行更应保持清醒头脑。

一方面，把握当前扩大内需及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浪潮，把消费金融作为结构优化、盈利稳定器的重要战略举措，积极开拓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汽车消费贷款、大宗商品消费贷款、旅游贷款等在内的居民消费信贷市场，优化信贷资产结构。

另一方面，重点跟踪、密切关注智能制造、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对城商行信贷投向所产生的影响和变化，通过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优化传统信贷投向；同时，积极以产业投资基金、投贷联动等新型的业务模式，推进公司业务转型。

### 5.2.3 用精细化管理实现降本增效

对中小银行而言，必须补足金融科技的短板，才能保证在未来的竞争中不掉队，这需要中小银行自上而下推动数字化转型，从前台和中后台都进行数字化能力的提升，推动业务与管理的全面数字化改造。面对利率市场化对中小银行盈利和发展空间的直接挤压，城商行需转换效益增长方式，通过低成本、高效益的精细化管理去拓展市场空间。

一方面，提高对成本管控的重视程度，把成本费用当作资源进行营运，坚持费用资源与效益相结合，坚持机构、条线、产品等多维度的任务分解及预算控制分析，将成本管控及降本增效的意识，有效地传递到每个部门、分支机构及个人，以有限的资源，实现最大化效益。

在此过程中，还可开展“同业对标”。即选取先进的同业机构进行对标，对照标杆对成本费用的列支情况，进行评判，综合分析出实际中偏离标杆的指标。并对偏离度大的项目，查找原因、寻找纠正方法，通过对标确定成本管控的重点，进而强化管理。

另一方面，按照精细化管理要求，通过清晰量化业务流程，将成本效益控制管理渗透到经营的各个环节，并通过与财务管理系统的对接，进行业务成本收益计价，精确成本管理。而且对成本费用支出，要坚持“有保有压”的原则，费用政策要向业务发展倾斜，实行市场拓展费与业务收益挂钩政策，同时大幅压缩招待费、会议费、差旅费等行政管理费用。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6.1 本文结论

本文分别从内外部因素出发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成因进行分析，经济、金融、利率、监管、政策等外部因素和银行本身的内部原因都有可能致城商行形成不良贷款，并新冠疫情前后城商行不良贷款、盈利能力、资本充足性等角度进行比较，总结新冠疫情之后城商行不良贷款规模上升、区域分化、不良处置加大等特征变化。

本文从企业、个人和银行本身等直接路径全面系统地分析新冠疫情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的影响，疫情发生后，企业部分违约风险上升，居民部门还贷能力下降，银行部门盈利缩小，都直接导致了城商行不良贷款的上升。从“宽信用”、“宽监管”和“宽货币”等政策层面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的间接影响路径进行分析，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在“宽信用”、“宽监管”、“宽货币”的政策导向下，整个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偏向宽松，但这种政策环境并不利于城商行的转型发展，反而强化了粗放发展的路径依赖，间接的导致不良贷款风险的增加。

在实证分析上选取 2018 年一季度至 2020 年四季度的 9 个经济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分成宏观、行业和银行等三个层次，选取 20 家上市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建立连续型双重差分模型对新冠疫情对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进行稳定性和影响机制检验，得出了受疫情冲击越严重的地区，经济受影响越明显，因而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增加得越多的结论，而且疫情对城商行不良贷款率且具有连续且时滞性的影响。相比高拨备覆盖率的城市商业银行，疫情更能提高低拨备覆盖率、抵御风险较低的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选取银行资本充足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了稳

健性检验。选取工业增加值和居民人均收入作为渠道变量，进行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说明工业增加值和居民人均收入对城商行不良贷款有负向的影响。最后，在理论和实证结果的基础上，对城商行不良贷款处置和有效预防疫情带来不良风险的措施提出相关建议。

## 6.2 研究展望

本文对于城商行的不良贷款处置还未深入研究，对于不同类型的贷款也未做详细的分类，接下来可以对城商行不良贷款分类分析，从个人不良贷款、企业不良贷款等更细的分类角度再进一步研究其成因和影响因素。

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比较“上市城商行”、“股份制银行”、“国有大行”等不同类型的银行的坏账率受疫情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Jimenez, G. and Saurina, J. Credit Cycles Credit Risk and Prudential Regulation [R]. Banco De Espana Working Paper, No.0531, 2005.9 — 11.
- De Bock, R. and Demeyants, A. Bank Asset Quality in Markets: Determinants and Spillovers[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2, 71(12):4 — 26.
- Salas, V. and Saurina, T. Credit Risk in Two Institutional Regimes: Spanish Commercial and Savings Bank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2002, 22(03):203 — 224.
- Acharya, Viral V., Eisert, Tim, Eufinger, Christian, Hirsch, Christian, 2018. Real effects of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in Europe: evidence from syndicated loans. *Rev. Financ. Stud.* 31 (8), 2855–2896.
- Acharya, Viral, and Sascha Steffen. 2020, "Stress tests" for banks as liquidity insurers in a time of COVID." *VoxEU.org*, March 22.
- Aiyar, Shekhar, Bergthaler, Wolfgang, Garrido, Jose M., Ilyina, Anna, (Andy)
- Jobst, Andreas, Kang, Kenneth, Kovtun, Dmitriy, Liu, Yan, Monaghan, Dermot, Moretti, Marina, 2015. A Strategy for Resolving Europe's Problem Loa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5/19.
- Ari, Anil, 2017, "Sovereign risk and bank risk-taking," IMF Working Paper, WP/17/280
- Balgova, Marta, Alexander Plekhanov, and Marta Skrzypinska, 2017, "Reducing nonperforming loans: stylized facts and economic impact", mimeo.
- Beck, Thorsten 2020. "Finance in the times of coronavirus," in: *Economics in the Time of COVID-19*, an e-book.
- Beck, Roland, Jakubik, Petr, Piloiu, Anamaria, 2013. Non-performing loans: what matters in addition to the economic cycle? Working Paper Series 1515. European Central Bank.
- Belloni, Alexandre, Chen, Daniel, Chernozhukov, Victor, Hansen, Christian, 2012.
- Sparse models and methods for optimal instrument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eminent domain. *Econometrica* 80 (6), 2369–2429.

- Belloni, Alexandre, Chernozhukov, Victor, 2013. Least squares after model selection in high-dimensional sparse models. *Bernoulli* 19 (2), 521–547.
- Berger, Allen N., DeYoung, Robert, 1997. Problem loans and cost efficiency in commercial banks. *J. Bank. Finance* 21 (6), 849–870.
- Boudriga, Abdelkader, Neila Boulila, Taktak, Sana, Jellouli, 2009. Banking supervision and nonperforming loans: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J. Financ. Econ. Policy* 1 (4), 286–318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pages November.
- Brunnermeier, Markus K., and Ricardo Reis, 2019, “A crash course on the euro crisis,” NBER Working Paper 26229.
- Cerra, Valerie, Saxena, Sweta Chaman, 2008. Growth Dynamics: The Myth of Economic Recove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 (1), 439–457.
- 王丹阳.浅谈新冠疫情下中小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J].经济研究导刊, 2020 (35):123-124.
- 王旌全.疫情对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影响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21 (02):60-61.
- 陶秉吉, 张祥龙.新冠肺炎疫情下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21 (04):72-74.
- 刘杭.新冠疫情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J].经济研究导刊, 2021 (02):120-122.
- 王云龙, 叶皓明, 李赓, 李论, 杨晓光.新冠疫情对我国信贷风险冲击的定量测算[J].系统与数学, 2021, 41 (01):40-58.
- 梁秋霞.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 2012, (1):69-74.
- 张意磊.银行不良贷款持续增长原因及创新处置方式[J].中国市场, 2017, (5):54-55, 76.
- 孙明哲, 赵领娣.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 2020, (5):127-133.
- 中国银行研究院全球银行业研究课题组.疫情大流行对全球银行业的影响与应对——中国银行全球银行业展望报告(2020年第三季度)[J].国际金融, 2020 (07):66-75.
- 应海芬.经济增长与城商行不良贷款率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 2018 (10):98-105+110.
- 魏爽.中国商业银行信贷结构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研究[D].吉林大学, 2018.

- 陆畅. 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影响因素的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 2019.
- 李波,王广宇.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收入结构与经营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 52 家城商行 2014-2019 年面板数据分析[J].金融发展评论,2020(08):1-12.
- 张楚晗. 城市商业银行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的影响因素分析[D].上海财经大学,2020.
- 丁溧.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成因及处置研究[J].经济管理文摘,2020(09):5-6.
- 邓娇娇. 区域市场化程度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20.
- 李荣枫. 不良贷款目标控制下中国银行业效率改善与最优不良贷款率选择[D].华中师范大学,2020.
- 王杰.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动因及管控优化研究[D].南京大学,2020.
- 叶欣,王佳媛.资本监管压力对商业银行低估不良贷款的影响[J].上海金融,2020(03):73-79.
- 纪淼,李宏瑾.当前我国中小银行风险成因及政策建议[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9(12):48-54.
- 徐红芬,刘小辉,郑宵鹏.我国中小商业银行风险状况评估研究——以上市城商行为例[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9(08):62-70.
- 王恩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对其资产质量的影响——来自上市商业银行微观数据的证据[J].金融发展评论,2019(07):63-75.
-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全球银行业研究课题组.贸易摩擦背景下全球银行业面临新挑战——中国银行全球银行业展望报告(2019 年第三季度)[J].国际金融,2019(07):58-67.
- 王睿.商业银行贷款发放与产生不良贷款的时间滞后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8(26):151-154.
- 丁浩.产业结构转型、经营效率与城商行不良贷款率[J].上海金融,2018(06):75-80.
- 魏蓉蓉,邹晓勇.我国上市城商行和农商行竞争力比较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8(05):109-114.
- 张敏,童丽静,张珂源.政治资源有助于城市商业银行“走出去”吗——来自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经验证据[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8,38(04):873-884.
- 应海芬.经济增长与城商行不良贷款率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8(10):98-105+110.

吴琼,刘凯頔.货币政策、资本约束与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J].宏观经济研究,2016(11):94-105.